

【论 文】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三个层次¹

(1917-1949)

杨恕、郭黎鹏²

【内容提要】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始终未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及其与中央政权之间充满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同时，中央和地方政权与各种外国势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苏联（苏俄）对华关系最为特殊，存在着三个主体和三个层次，即苏联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苏联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从 1917 年到 1949 年，中苏关系在大部分时间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交往，苏联对华政策虽有国际共产主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追求其国家利益，这使三层关系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重心也发生转移。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多层次和多主体特征使这一关系成为同期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并留下了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领域除中苏关系之外，还有苏联史、国际共运史、共产国际史、民国史、中共党史等。多层次、多主体这一特征应该是研究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关键词】 民国；中苏关系；国家利益；地方政府

引 言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简称苏俄。此后的 70 多年里，苏联（苏俄）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一些影响至今存在，这使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交往关注较多，这与中苏之间的结盟和转为对抗有很大关系，但对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并多为以下几种类型：（1）对民国时期中苏两国官方交往过程的叙述和分析，时间一般是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2）对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分析，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决定和指示中，许多并不是独立做出的，而是在联共（布）或斯大林的指示下形成的，对此，拟另文讨论，本文对这一部分内容仅略有涉及。（3）对中苏关系中具体问题的探讨，如中苏建交、中东路事件、苏联援华等。总体而言，学者们对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进行了不少考察与分析，但是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对于民国时期中苏关系整体和宏观的思考、梳理和分析似乎不足，这对充分认识这一关系在世界历史及相关领域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不利的。

从 1912 年到 1949 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直未能对整个国家实施有效管辖，国内存在着多种力量或集团，这成为中华民国对外关系多主体的主要内部原因。因此，在讨论中华民国对外关系时，不能笼统地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在中央政府与外国交往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本文所说地方政府，指地方的合法政府，不包括其他政权）也与外国交往，甚至采取完全不同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在此方面，苏联对华关系最具代表性。苏联除了与中华民国中央政

¹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学刊》第 8 卷总第 45 期（2018 年第 3 期），第 5-18 页。

² 作者：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黎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府、地方政府交往外，还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这使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一个。具体来说，民国时期苏联与中国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苏联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第二层，苏联与中国地方政权，其中最突出的是东北和新疆政府；第三层，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在大多数时间里，这三层关系是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学界对于这方面涉及的具体问题曾有类似分析，如对 1929 年中东路事件的相关研究，对张学良、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不同反应进行了论述¹。但是少有学者对 1917-1949 年中苏交往的整个过程进行三个层次的分析。为此，本文尝试做一努力，以期此方面的工作有所进展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笔者归纳梳理了在三个层次上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合与分离，并对苏联政策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由此做出一些总结和思考。在此需要说明，外交关系和交往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不同的，这明显体现在中苏关系的三个层次之中。简单地说，有交往并不意味着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建了交，也可能关系不正常或交往程度很低。

三个层次及变化

1917-1949 年间的中苏关系纷繁复杂。通过对这一时期苏联与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史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中苏交往的 32 年中，苏联与中国交往的重心发生过多转移，在大多数时间里，以中央政府为主，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不连续；在三层关系中，与中共的关系最稳定，而与地方当局的关系变化最大。下面，以苏联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为主线，叙述中苏关系三个主体、三个层次的概况。

1917 年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追随帝国主义势力，不承认苏俄这一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与帝俄驻华外交机构保持了数年的关系，而苏俄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即加拉罕宣言），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1922 年 12 月 31 日，苏联建立，1924 年 5 月，中国与苏联建交。此前两国中央政府之间基本不存在实质性联系，但在东北、新疆等地，苏联（苏俄）领事机构和地方当局却有较多的交往。建交之前，由于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苏联（苏俄），包括共产国际，开始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1923 年 1 月 26 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就表明了此时中苏关系的重心和实质。中苏建交后，两国中央政府间往来并不多。1925 年 7 月，广州国民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苏联对广州国民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给予了大量援助。由于此时国共合作，所以苏联的援助惠及国共双方，但以国民党为主。苏联对广州政府的援助，是其对华政策采取双重原则的一个标志，即一方面考虑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考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交往对象采取不同的原则。1928 年 6 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南北对立的局面结束，国民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虽然国民政府在 1948 年 5 月 20 日改为总统府，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执政的实质没有改变。其间，中苏两国关系发生过几次重要变化：第一次是 1929 年 7 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导致两国断交（1932 年 12 月 12 日复交）；第二次是 1937 年七七事变后，苏联向中国提供 2.5 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此项贷款只使用了 2/3），这表明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第三次是 1945 年 8 月 14 日两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国民政府改变了对蒙古的政策。总之，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主体是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其基础是外交关系，但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交往对象，而且，由于国家间实力

¹ 参见杨奎松，《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载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6-61 页；杨奎松，《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载《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马蔚云，《从中俄密约到中苏同盟——中东铁路六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9-294 页。



的巨大差异，这一关系是不平等的，苏联多次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两国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苏联与中国东北和新疆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与广东的关系如前述）。苏联与这两个地区的关系有明显的继承性。据笔者统计，从1689年到1917年，中俄共签订了110项条约，其中与东北相关的有52项，占47%，内容主要涉及划界、商贸、铁路、邮政等；与新疆相关的有22项，占20%，主要涉及部分土地居民的归属、划界、商贸、采矿、邮政等¹。而继承性说明了苏联在这两个地区有重要的利益。

第一，苏联与东北关系。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继承了帝俄在东北的领事机构，并与张作霖—张学良政权建立了互不信任的低水平关系。1929年7月发生中东路事件，两国断交，但双方的领事机构并没有完全撤离。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允许一部分抗日义勇军退入苏境，并将其转运至新疆。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苏联与之建立了领事关系。1932年12月，中苏两国复交。1935年3月24日，苏联把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尊重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东北，消灭了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随之覆灭。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一方面把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交给中共，帮助中共在东北各地建立政权；另一方面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保持着关系。苏联在东北同时与对立的两个政权打交道，充分体现了其对华关系中的双重原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苏联与伪满洲国的关系，不属于与中国官方关系的范围，是另一种性质的对外关系，本文不予论述。

第二，苏联与新疆关系。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新疆由杨增新主政（至1928年7月）。新疆政府与苏方就贸易和联合打击进入新疆的白卫军多次接触并达成协议。1920年5月27日双方签订了《伊犁会议定案》（又名《伊犁临时局部通商章程》）。苏俄红军在1921年5-6月进入新疆消灭了白卫军的主力，之后撤出。这一时期，尽管两国尚未建交，但苏俄向原帝俄在新疆的五个领事馆（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塔城、阿勒泰）派出了自己的官员，造成新旧政权领事之间的纠纷，杨增新政府也在苏联设立了五个领事馆（阿拉木图、斜米、斋桑、塔什干、安集延）。总起来说，杨增新时期苏联与新疆的关系是平稳的，苏联基本没有干预新疆事务。1929年，中东路事件使两国断交，但并未影响到苏联与新疆的关系。

1931年10月，主政新疆的金树仁未获中央政府批准，为了得到苏联的武器，签订了不平等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1933年初和1937年夏，苏联两次大规模出兵新疆，扶持和帮助盛世才政权，打击反政府力量²。盛世才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提出了“反帝、亲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所谓六大政策，极力密切与苏联的关系，甚至向斯大林提出了加入联共（布）的要求³，同时与中共发展关系，任用了一批中共干部，向中共提供帮助，如接应红西路军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用苏联贷款购买的大批武器和军事装备经由阿拉木图到兰州的陆运路线输送到抗日前线。这一时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苏联与国民政府、地方政府、中国共产党三者的关系少见地组合在了一起。1940年11月，盛世才与苏联签订了《锡矿协议》，严重损害了新疆的利益和国家主权。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不久，盛世才错误地判断了战场形势，认为苏联靠不住了，转而投向国民党，并采取排挤苏联的政策，迫使苏联撤出了在新疆的企业、贸易代表处等机构和驻军，恶化了与苏联的关系。与此同时，盛世才打击迫害中共组织和

¹ 笔者整理的相关条约，主要参考了王铁崖编写的《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1959年版。

² 曹伟、杨恕，《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两次出兵新疆及其原因》，载《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

³ Письмо дубаня Шэн Шицяя т. т. Сталину, Молотову, Ворошилову. Июнь 1934// В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23, С. 3.



人员，使中共在新疆的力量基本丧失，也使得中共与联共（布）在新疆的关系中断，之后，中共对苏联在新疆的作为完全不了解。

1944年，国民政府以军事为后盾，使盛世才离开新疆，新疆回到了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5月4日通过决定¹，采取措施恢复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和利益，各项行动随之展开。1944年11月，苏联支持下的“三区革命”爆发，迅速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对新疆省政府造成极大压力。应该指出的是，苏联对新疆的这一做法，对中共也完全保密。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9月15日，联共（布）中央做出决定，改变在新疆的政策²，三区遂停止与政府的对抗，参加省联合政府。1947年8月，三区与省政府关系破裂，三区代表离开乌鲁木齐。至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三区一直处于和政府对立状态。以上事实说明，新疆在苏联的对华政策中一直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

据我们查到的资料，仅在1931年到1947年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涉及新疆的决定就有60多个，而且内容都是干预新疆事务。仅此一例，足以证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目的。斯大林的德文翻译瓦连京·别列日科夫（Валентин Бережков）曾回忆说，“起初我很惊奇：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文件中，新疆被划分为一个特殊地区并由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坎诺佐夫³负责。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中国的这个省事实上是由莫斯科在管理”⁴。另一位俄罗斯学者克拉西里尼科夫也对此表示了看法，他写道，“苏联领导人在组织‘三区革命’中的主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同样的是，起义运动直接依赖于莫斯科的立场，取决于苏联方面帮助的程度和规模，这些对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主导作用。总之，新疆民众在苏联领导进行的一场与中国的政治大博弈中，只是一张可以用来交换的牌”⁵。在民国时期苏联对华关系中，苏联与三区革命的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唯一的，拟另文讨论，于此不赘。

综上，在民国时期苏中关系的三个层次中，能够被认为没有中断（短时的中断是因为技术原因，而不是双方意愿）而且比较稳定的，只有中共与联共（布）的关系。双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无产阶级革命为目的，建立了新型政党关系。尽管联共（布）（包括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做出过一些错误决定，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并没有使两党关系出现严重问题。苏联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曾一度中断，之后虽一直延续，但由于种种原因，交往水平不高，只有在七七事变发生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两国关系较为密切。苏联与新疆和东北这两个地区的关系很复杂，而且，两对关系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新疆，苏联先后与三个地方政府来往，这三个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对苏联的政策也不同，而苏联对它们的政策前前后后也发生很大变化。在东北，苏联先是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后来又无视中国主权与傀儡政权交往，抗日战争结束后，又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打交道。

在中苏关系的三个层次中，变化最大的是苏联与地方政府。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政府实际上已不存在，这一层次的关系仅在新疆保留。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收回新疆的管辖权后，这一层次基本就不存在了，三个层次减少为两个，而苏联与满洲国和三区政权的关系虽属于苏联和中国某一地区的关系，但不在本文所说三个层次之中。这两个属于其他类型的关系使中苏美

¹ Реш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 (б) «О Синьцзяне». 04. 05. 1943 //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37, с. 76.

² Реш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 (б)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иньцзяне». 15. 09. 1945. //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37, с. 150-151.

³ 杰坎诺佐夫（Деканозов В. Г.），格鲁吉亚人，与贝利亚关系密切，曾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副局长，是大清洗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贝利亚被处决后不久，他也被执行死刑。

⁴ Обухов В. Г. Беловодье в огне: Битва за Синьцзян, М.: Крафт+, 2014, с. 431

⁵ Владимир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иньцзянское притяжение, М.: Дипакадемия, 2007, с. 310.



系更为复杂。

从三个层次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出，苏联对华关系的重心也在变化。大致来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苏联（苏俄）与中国交往的重心在北洋政府，即中央政府，尽管两国尚未建交（1924年5月建交）。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从此前一段时期到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京，重心在广州国民政府，支持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是对华关系的主要指导原则。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苏联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继续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从多方面给予了领导和支持。至1932年12月复交，其间重心在中国共产党，但中共成为重心并不意味着苏联对其支持力度的增加或关系水平的提高，只是因为原有的重心不存在了。从复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致以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做分期界限，之前重心在国民政府，之后则转为中共。在上述过程中，除短时期的中断，苏联对华关系的主体一直是中央政府，国家关系是其主要的考虑。而与中国地方政府保持关系的原因是特殊利益，其中时间最长最特殊的是新疆。

苏联与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共三个层次的关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基本重合的时期不长，大致从西安事变到1941年底或1942年初盛世才改变对苏政策，持续时间大约五年。其间三层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中苏关系变冷、中国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等，这些内容已有不少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

苏联对华关系重心的变化，从主观方面来说，是因为其对华政策具有双重原则，一方面是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两者以前者为重。从客观方面来说，中国存在着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多种政权和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双重原则和多种政治力量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组合，造成了苏联对华关系的多层次和重心的转移，而中国国内地方政权的减少则是中苏关系层次减少的原因。

苏联对华政策嬗变的原因

中苏交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苏联方面看，国家利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际局势以及苏联国内情况等都是其确定对华政策目标时考虑的因素。笔者结合史实对此进行分析。

（一）国家利益高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将实现世界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并为此创立了共产国际，以推进世界革命。在意识形态上，列宁将马克思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利益高于一切——更具体化了。他的要求是：“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¹ 列宁的这两项要求被规定为共产党人最高的意识形态准则。苏俄政权建立伊始，就成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作为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机构²。在与中国的初期交往中，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国中央政府直接交涉，而共产国际则和孙中山接触，并帮助中国成立共产党。

¹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333页。

²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都是苏俄的机构，服从俄共（布）的指示。有学者总结道：“众所周知，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联外交机制的运行特点是，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是按着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的：一个是通过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通常都设立的外交部门，即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个是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政治局还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920–1925, М., 1994. 转引自薛卫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代总序第2–3页。



可以说，这两个机构有不同的分工。1924年前，苏俄（苏联）明显重视中苏复交，以打破被帝国主义势力封锁的局面。随着政权的巩固，国家利益被提到更高地位。苏俄（苏联）政府认为：“现在，我们的对外政策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即每一寸苏维埃土地、每一个苏维埃卢布都应该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不经过一番艰苦斗争，我们绝不向其他国家让一分利。”¹换言之，在苏联看来，此时“打破国际孤立局面”比“促进中国革命”更加重要。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斯大林建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²。后来鲍罗廷在中国的确遵循了这样的原则，这使陈独秀认为鲍罗廷在“加强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别，削弱民族革命的宣传作用”³。

但是，苏联的这种做法也并不意味着苏联不重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很多帮助。其中包括对中共的政策指导，以及大量物质、经济、政治和组织援助⁴。“在中国，中共是苏联唯一的盟友和同志，苏联可以不援助任何人，唯独不能不援助中共。”⁵但是另一方面，苏联把中共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工具。列宁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确定了行动标准，他认为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核心，因而他“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即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行动应服从苏俄的利益⁶。联共（布）与中共关系中的例证之一——中东路战争爆发后，苏联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反抗国民政府。此外，苏联还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整个对华政策上偏向其他势力。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日本，苏联要求国共合作，尽管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苏联同情中共，但是“中共还显得太孱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⁷，“如果我们（苏联政府）公开讲出这种同情，就会使蒋介石疏远我们”⁸。皖南事变爆发后，毛泽东立刻做出反应，指出应当“在政治军事上迅速即准备作全面大举反攻”⁹，但是共产国际反对国共两党发生战争，认为“这种战争只会对日本人有利”¹⁰。毛泽东不得不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明显分歧¹¹。

一个政府重视自己国家利益是理所应当的事。作为国家基本需求的体现，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国家的对外行动目标¹²。但是，对本国国家利益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他国利益，甚至侵犯他国主权。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担心同时受到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的夹击，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独立和恢复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作为向

¹ 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

²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³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⁴ 杨奎松曾经系统总结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苏联给中共提供的物质援助。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168页。

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⁶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页。

⁷ [苏]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5-36页。

⁸ 同上，第55页。

⁹ 《毛、朱、王关于我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并告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94页。

¹⁰ [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马细谱统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22页。

¹¹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97页。

¹² 李少军：《论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日本出兵的条件，英、美两国为了使苏联尽快出兵，答应了苏联的要求，三国就此达成了秘密协议，中国主权再次遭到侵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忽视甚至侵犯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主义的表现。

（二）国际局势影响中苏交往

中苏关系是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关系，同时这一双边关系又处于世界体系中，必然会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和冷战前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从1932年到1937年，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围绕复交及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但双方同时也分别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甚至都优先处理对日关系，这导致中苏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西安事变后，由于“苏联所希望者为南京政府领导全国各党派组织统一战线或人民阵线政府”¹，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进程加快。七七事变后，基于日本威胁的加大，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谴责日本，声援中国²。然而，“随着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达成，中苏关系逐渐恶化”³。另一个时期是冷战前期。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冷战已正式开始，但苏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⁴。斯大林此时对中共的态度是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⁵，因此他一直拖延毛泽东的访苏请求。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准备立刻渡江，但斯大林希望毛泽东接受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尽管毛泽东最后同意和谈，但他对苏联非常不满⁶。

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局势以及在此期间的苏日关系、冷战以及在此期间的苏美关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苏联在与中国不同层次主体交往中的政策重心，进而影响中苏关系走向。

（三）苏联内部纠纷影响对华政策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领导层内部曾存在过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列宁-斯大林的权力交接时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非常激烈。托洛茨基主张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成立苏维埃政府⁷，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⁸。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继续肯定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⁹。七一五政变后，斯大林又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的理论，并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还没有到来¹⁰，以此为他所主张的国共合作辩护。然而一个月后，斯大林明确肯定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要求中国共产党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成直接斗争口号

¹ 任骏、孙必有：《蒋廷黻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

² Lawrence K. Rosinger, “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Pacific Affairs*, Vol. 13, No. 3 (Sep. 1940).

³ 张毅：《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⁴ 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⁵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⁶ 参见《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2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调停的态度（1949年1月13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1949年1月14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46-355页。

⁷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第244页。

⁸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8-329页。

⁹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1页。

¹⁰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应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阵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是会到来的。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5页。



¹。看来，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使斯大林坚持国共合作的态度，即使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也不放弃，只是时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转变态度。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布哈林与斯大林的矛盾激化。布哈林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斯大林认为“布哈林集团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并强调各国共产党内右倾及对右倾调和态度的危险性与反对右倾分子的必要性。共产国际随即要求中共加紧反右倾斗争，进行革命运动。中共中央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准备在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由于国民党政权力量强大，中共损失惨重²。可见，苏联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尤其是与中共的党际关系，受到了这一时期联共（布）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联共（布）内部的斗争时间并不长，随着斯大林对反对者的清除，这种情况很快就结束了。联共（布）党内斗争仅影响了中共，对两国关系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却对中共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结语

从1917年到1949年，中国的中央政府、几个地方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与苏联有直接交往，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也在不断改变，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注重其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同时，双方交往的层次也在减少，从三个层次逐渐集中在两个层次上，实际上变成了苏联与国共两党之间的交往，而且苏联更加重视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贯穿始终的是苏联对其国家利益的重视，虽然也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但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支持明显是苏联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手段。苏联重视国家利益无可厚非，但是违背国际原则甚至侵犯中国主权，就是不正当的。

本文非常简要地叙述了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三个层次，遗憾的是，未能从理论方面多做深入的分析 and 总结。苏联对华关系的双重原则和中国政治力量的多元是造成这种关系的最主要原因，国际环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这一关系既复杂，又充满了疑问，许多问题有待更深入发掘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国内对这三个层次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在两国中央政府关系和联共（布）与中共关系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更多。但笔者认为，在中苏关系研究中对苏联与中国地方政权关系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不仅影响到中苏（俄）关系史，而且也影响到对苏联史、国际共运史、共产国际史、民国史、抗战史、中共党史、地方史等领域一些问题的探讨，同时还影响到了对中苏关系评价分歧较大这一现状。为此，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应该加强。此外，与中苏关系多层次、多主体相关的苏联对外政策中两个原则的变化和关系、后果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关系等，也都存在不少有待研究的空间。

¹ 黄修荣：《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289页。

²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第310-320页。



【论 文】

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美国本土藏学批判¹

沈卫荣²

一、

年岁见长，难免怀旧。近日喜听老歌，崔健的一曲《浪子归》，听了一遍又一遍，越听越入味，越听越入戏，有时忍不住还自顾自地吟唱起来，无端生出很多“酸的馒头”（sentimental）来。遥想当年初听此曲时，少年不识愁滋味，还听不出“岁月匆匆似流水，它一去不再回”的无奈。今日再听，却袭来愁绪满怀，弹指间，原来已经三十余年过去了，却道天凉好个秋！

初听《浪子归》时，我刚开始学藏文，雄心勃勃要推开藏学这扇沉重的大门；此后，转战南北东西，于今可算是藏学界当仁不让的一员老兵。然受累世习气和世间八风所碍，迄今既未有证悟，亦无所成就。回眸过去，往事如烟，难免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仿佛突然间重又回到了那扇沉重的大门口，兀自推门而入，却见门内景象，早已与三十余年前所见迥然不同。准歌中所云，“面对镜子我偷偷地窥，岁月已上眉，不忍再看见镜中的我，过去已破碎。”

却无奈古德有言在先，“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故虽不忍再看，但禁不住还要放眼远眺一番。不指望能独具慧眼，将这个曾经魂牵梦萦的象牙塔或香格里拉彻底看个明白，但求能独善其身，知道自己目前身落何处，不至于完全迷失在这风云变幻的学术江湖之中。

二、

初入藏学之门时，中国与世界的联结远不像今天这么紧密，我对海外藏学的了解不多。当年的藏学也远不如今天这么热闹，公认的大家寥寥可数，我知道的只有意大利的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毕达克（Luciano Petech, 1914-2010）、英国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 1905-2000）、法国的石泰安（Rolf Stein, 1911-1999）、德国的霍夫曼（Helmut Hoffmann, 1912-1992）、匈牙利的乌瑞（Geza Uray, 1921-1991）等等不多的几位。他们全都是欧洲学者，虽然学术各有专攻，也各有各的卓越，但大概都可以被认为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或者亦可以把他们归类为东方语文学家（oriental philologists），抑或文本语文学家（textual philologists）。不管他们研究的是哪个专题，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严格说来都是欧洲学术传统中的语文学。我本科读历史学专业，进入藏学的缘分源自对蒙古时代之西藏历史的兴趣，当时从蒙元史转入藏学的入门训练，除了跟随王尧（1928-2015）老师学习藏文外，就是阅读和翻译上述这些藏学大家们的著作。我对他们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对欧洲传统的语文学方法也心悦诚服，真心觉得他们是学界翘楚、人生榜样，他们所做的这种历史学和语文学的学问（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approach）就应该是藏学研究之正宗。

可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藏学的面貌于国际学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藏学研究机构 and 藏学家的数量激增，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西藏研究队伍的异军突起，严重改变了世界藏学的传统格局；另一方面，藏学从学术方法到研究领域，均日趋

¹ 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网之《上海书评》2018年8月23、24、25日号。

² 作者为 清华大学 人文高等研究院 教授。



丰富和多元，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取径显然已不再是国际藏学研究中一枝独秀的主流传统，上述这几位藏学大家和他们所代表的学术传统渐渐失去了绝对的权威地位，已不再是国际藏学界之公共视野的聚焦点。随着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浪潮的兴起，上述这一代学人所代表的欧洲东方学传统成为后辈同行学者们激进地批判和解构的对象，其学术中隐藏着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得到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一代学术大师们普遍具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背景和身份，使得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和俾倪天下的学术成就立马黯然失色，失去了往日熠熠照人的光辉。

例如，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西藏学家的图齐先生在其身后却遭遇了滑铁卢，他的学术人生的另一面被人无情地揭露了出来，说他原本竟然是一位活跃的纳粹分子，曾经是墨索里尼纳粹政府要员的亲信，还曾经用力地吹捧过日本军国主义；¹而最早对吐蕃金石碑铭做了非常出色的研究的黎吉生先生，其政治身份本来就众所周知，他是英帝国主义直接派驻西藏的殖民官员，而他以前并不广为人知的丑事后来也被揭露了出来，他不仅要为热振活佛遇害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还可能也与根敦群培受难有直接的牵连。²而霍夫曼本人在二战期间曾是希特勒纳粹政府建立的、直接以宣传雅利安人种之优越为宗旨的“祖先遗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纳粹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研究西藏的动机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有脱不开的干系。³总而言之，在我曾经十分推崇的那一批藏学大家中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在政治上不很光彩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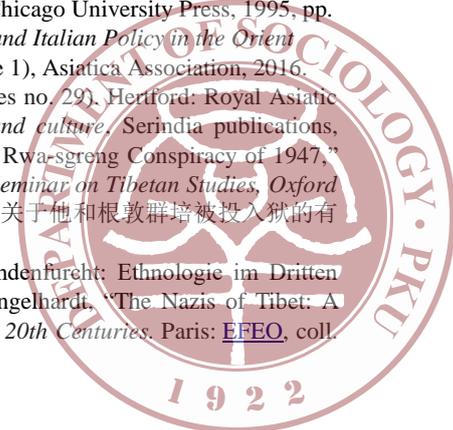
不仅如此，整体而言，西方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接受和表述自古以来就是在西方自身之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和主导下的一种人为的想象和建构，它们不但始终受到了西方之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沾染，而且与现实的、物质的西藏从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西方的藏学研究无始以来就与欧洲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直接和紧密的关联。被人称为“藏学之父”的匈牙利学者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1784/8-1842）原来是一位激进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他的东方寻根之旅本来是受民族主义的驱使，最终却被一位英国殖民主义者引导到了藏人居住的拉达克地区，他所开创的西藏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直接为英帝国主义者日后侵略西藏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而乔玛之后的西方藏学家们，不管他们的学术能力是如何的出色，但都从未能够摆脱不同时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舆论对他们的束缚和影响，其学术研究凸显出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质。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们借助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先生创立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这个批判的武器，对西方前辈东方学家们及其学术研究成就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解构，这对于反思西方的思想史和学术史，清算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流毒，无疑具有十分进步和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清算对于西方的东方学传统而言，它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弑父式的暴力行为。随着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学术权威们被一个个地拉下神坛，他们所传承的那种优秀的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学术传统也黯然失色，甚至惨遭

¹ 对图齐的批判参见 Gustavo Benavides, “Giuseppe Tucci, or Buddhism in the Age of Fascism,”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Donald S. Lopez, Jr. ed.,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1-196; Enrica Garzilli, *Mussolini's Explorer: The Adventures of Giuseppe Tucci and Italian Policy in the Orient from Mussolini to Andreotti. With the Correspondence of Giulio Andreotti*. (Volume 1), Asiatica Association, 2016.

² 他的主要著作有: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James G. Forlong Series no. 29), Hertford: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 1998. 关于他和热振事变的关联和一面之词参见他的回忆文章, “The Rw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Oxford 1919* (Warminster, 1980),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eds., pp. xvi-xx. 关于他和根敦群培被投入狱的有可能的关联参见 Lopez 对根敦群培之生平的多种描述, 详后。

³ 参见 Reinhard Greve, “Tibetforschung im SS-Ahnenerbe,” *Lebens lust und Fremdenfurcht: Ethnologie im Dritten Reich*, ed. Thomas Hauschild, Frankfurt: Suhrkamp, 1995, pp. 168-199; Isrun Engelhardt, “The Nazis of Tibet: A Twentieth Century Myth,” Monica Esposito (ed.), *Images of Tibe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Paris: EHEC, coll. « Études thématiques » (22), vol. I, 2008, pp. 63-96.



唾弃。更有甚者，他们曾经用心研究，并想要代表和表述的那个东方，亦同时遭到了其后辈们的激烈批判，甚至也在有意无意间被无情地解构和抛弃掉了。东方本来就曾经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直接的政治和军事侵略的牺牲品，如今它又因为曾经被西方之东方主义传统下的东方学研究所沾染，故而再次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牺牲品。

三、

对西方藏学与生俱来的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做了最彻底的揭露和批判的著作无疑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 Donald S. Lopez, Jr. 先生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与西方》。¹ 这部名著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越了西方藏学界，它也曾是美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一部标杆性作品。在此之前，Lopez 还主编过另一本同样性质的论文集，题为《佛之主事们——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对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最著名的几位佛教研究大家，即英国的巴利文和小乘佛教研究权威 Thomas Rhys Davids (1843-1922)、匈裔英籍著名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 (Aurel Stein, 1862-1943)、于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禅学大师、日本学者铃木大拙 (1870-1966)、意大利藏学家图齐、瑞士心理学家荣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等人的生平和学术做了十分尖锐的剖析和批判，还特别对他称为“拜倒在喇嘛脚下的外国人”的他自己那一代美国藏学家们的学术和心路历程做了深刻的反思和解构。²

由于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重点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欧洲知识界与东方的交涉和互动，以及他们对东方之接受和表述的总结、反思和批判，所以，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欧洲的东方学和东方学家们。然而，Lopez 以东方主义理论为武器对西方藏学研究所做的清算，不但批判了从乔玛开始的欧洲藏学研究，而且还在书中以一专门的章节“领域”(field)，对美国的藏学研究做了尖刻的批评和嘲讽。美国本土藏学起步很晚，它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年代正是美国新时代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如火如荼的时候，它是一个西方世界对来自东方的各种神秘主义思想和传统都充满幻想和热望的时代，藏传佛教从其禅坐 (meditation) 到密修 (tantra)，均深得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新时代人的青睐和喜爱，它给新时代运动提供了很多精神上的动力和养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藏学开始启动，所以，其主要内容是对藏传佛教的宣扬和研究。

但是，正如石泰安先生的弟子、曾在美国从业的欧洲汉学家司马虚 (Michel Strickmann, 1942-1994) 先生曾经于 1977 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的那样，当时在美国出现的很多有关藏传佛教或者密教的著作，“事实上看起来不过是一些教那些活得有点不耐烦了的美国人如何能够放松一点的小册子。”³ 它们与司马虚熟悉的欧洲学术传统中的藏学研究著作之间显然有着很长的一段距离，美国人做藏传佛教研究首先考虑的好像不是学术，而是要替喇嘛们代言，为那些追求身体和精神同时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新时代美国人提供足够可口、可乐的心灵鸡汤。

正如 Lopez 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中所刻画的那样，美国本土藏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法主宗喀巴讲习教授的 Robert Thurman (1941-) 先生与其说是一位杰出的藏学家，倒不如说是一位成功的藏传佛教传教士，因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且辩才无碍，所以，他为藏传佛教，特别是其格鲁派 (黄教) 传统，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Thurman 的藏学著作往往会毫不掩饰地显露出藏传佛教中心主义的底色，背离了一位严肃的

¹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²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其汉译本《佛之主事们——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³ Michel Strickmann, "A Survey of Tibetan Buddhist Studies," *Eastern Buddhist* 10, 1977, p. 128.



宗教学者应该具备的客观和中立的学术理性，他对神话化西藏潮流在西方的出现和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Jeffrey Hopkins (1940-) 先生则是美国本土藏学之教学和研究传统的创立者，他培养了包括 Lopez 本人在内的一大批如今在北美诸大学从事藏传佛教教学和研究宗教学者。在 Lopez 看来，Hopkins 建立起来的这个藏学传统与欧美大学等学术机构中的比较宗教学教学和研究传统严重背离，因为它完全照搬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学僧的闻思修传统，所以，在他这里培养出来的藏学博士，其实际的佛学水准大概不过是在西藏格鲁派大寺院中受过训练的十几岁的沙弥、学僧就可以达到的水平。可见，这样的教学方法与其说是在美国的大学内培养藏传佛教的学术研究者，倒不如说是将西藏的寺院教学传统引进了美国的大学内，训练和培育的更可能是有能力在西方宣扬和传承藏传佛教的虔诚的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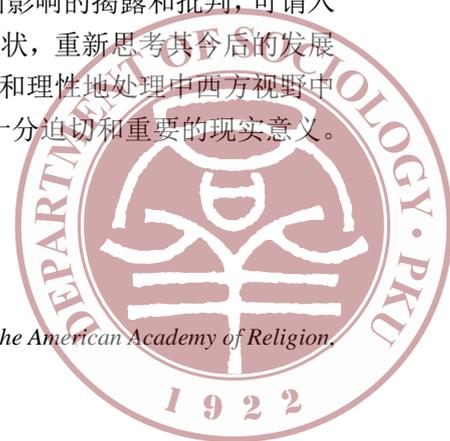
Lopez 本人当年不但接受了这种藏传佛教寺院式的教学训练，而且还将其投身藏学的学术使命明确为抢救和传承行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最直接、最正统的佛教传统。Lopez 那一代美国藏学家们曾天真地相信只有在那些流亡在印度的西藏喇嘛们的脑袋里才掌握着自释迦牟尼佛化现人间以来一直未曾中断过的要门 (man ngag)，如果这些要门有一天流失了，正宗的佛教传统也就断灭了，而这样的危险随着喇嘛们远离其故土而越来越迫近了，所以，像他这样的西方学生，觉得天降大任于他们了，必须立刻去印度，拜倒在西藏喇嘛们的脚下，将他们口传的要门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再将它们翻译成英文，然后继续传承下去。这是一项十分崇高和神圣的使命，是 Lopez 这样的美国年轻一代学者责无旁贷，应该肩负起的重大责任。显然，今天的 Lopez 是带着明显的自嘲和讽刺的口吻来反思这一段自己亲历的学术经历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在美国从事藏学研究曾经是一件具有远远超越宗教研究之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肩负了重大宗教使命和责任的伟大事业。可是，这个样子的藏学研究无疑与欧洲的具有批判理性的、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学术传统相距千里万里，甚至真的可以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不管是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欧洲传统藏学的解构，还是对于在新时代运动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本土藏学的批判，Lopez 作为一位“内鬼” (insider)，他对业内的脉络、行情，乃至其中的种种套路、勾当，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书中那些对权威和传统充满强烈反讽意味的细节描述和刻薄评论，读来让人觉得既妙趣横生，畅快淋漓，又句句中的，字字见血，具有无与伦比的杀伤力。有年轻的学术同行对他的这本书非常不满，愤怒地谴责 Lopez 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的批判有失偏颇和极端，认为 Hopkins 所建立的藏学传统并不能代表美国藏学研究的全部，美国还存在有其他别的不同的藏学研究传统。此外，也有人尖锐地批评 Lopez 在书中常常将西藏和藏传佛教与西方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建构混淆在一起，在他解构后者的同时，实际上也把前者一起给解构掉了，所以，Lopez 本人甚至比那些参与建构了香格里拉神话的藏学家们用心更加险恶。¹

这样的批评听起来并非毫无道理，但是，不管是从思想史，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上述 Lopez 对西方藏学研究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无疑都是十分有理和正确的，它对西方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和行为对于西方之藏学研究传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揭露和批判，可谓入木三分，且振聋发聩，它不但对于西藏学家们反思西方藏学研究之现状，重新思考其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对于今日西方之普通民众们思考应当如何来正确地理解和理性地处理中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和西藏问题，都是一帖及时的警醒剂，都将深有启发，故具有十分迫切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¹ 对 Lopez 之《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书的多篇评论和 Lopez 的回应，见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9, No. 1 (Mar., 2001)。



《香格里拉的囚徒们》的出版使 Lopez 先生即刻名满天下，不但在藏学和佛学领域内一时风光无限，而且也成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界的名流，成功地从美国学术的边缘打进了中心。此后，他很快又入选为美国文理学院的院士。Lopez 对包括他自己导师在内的学术前辈及其学术传统所做的革命性的批判和解构，彻底打倒了欧美藏学、佛学界的众多前辈学术权威，驱散了萦绕在欧洲东方语文学传统之上的那圈熠熠照人的光环。与此同时，Lopez 也树立起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今日他于学界之地位的崇高，恐怕是他老师 Hopkins 先生所望尘莫及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学术，这是世间学人都应当明白和接受的道理。在这一点上，西方学人显然表现得更加开明和理性，后辈在学术上批评和挑战前辈，这表明的是学术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记得当年初读《香格里拉的囚徒们》时，我禁不住热血沸腾，觉得处处令我茅塞顿开，从此便成了 Lopez 的忠实粉丝。可大概也是因为读这本书入戏太深的缘故，从那时起我潜意识中便生长出了一个“香格里拉情结”，至今未曾解开。不管是谈学术，还是论人生，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去解构那个想来应该十分美好，令人无限神往的乌托邦——香格里拉。

岁月荏苒，弹指间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不消说，在这二十年间，国际藏学和佛学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人、新著迭出，硕果累累，十分令人欣喜。这些年来，我读了不少美国新一代藏学家们的著作，特别是继续一本又一本地读着 Lopez 接二连三出版的很多新书，对他的勤奋和高产我发自内心地钦佩和羡慕。可是，那一个 Lopez 式的问题却始终萦绕着我，我总是忍不住想问：今天的我们依然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我特别想知道今天的藏学家们是否受到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们》的启发，已经改弦更辙，真的能够摆脱当今国际社会之主流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期待和设定了；还是 Lopez 的当头棒喝事实上并没有令他们幡然醒悟，今天的藏学研究依然还不过是在构建一个我们自己魂系梦萦、渴望拥有的香格里拉？

2005 年，威廉姆斯学院的 Georges Dreyfus 在其“我们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西藏研究”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Lopez 对藏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的批评虽然有用，但在有些方面矫枉过正，夸大了东方主义的影响，并将一个封闭的总体性（totality）赋予西藏文化，以非历史的眼光将西藏文化固化为在西方文明介入下保持一成不变的实体。与此同时，他并未提供任何取代东方主义的解决问题之道，相反，在其自身的学术实践上仍然承袭着他所戮力批判的传统。¹无疑 Dreyfus 对 Lopez 的批评是十分有见地的。显然，像 Lopez 这样的一批后现代 /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大家们，在解构其前辈的学术时，干得非常干净、彻底和漂亮，可是，在此之后，他们却并没有用心来建构起一套非东方主义、非帝国主义 / 殖民主义的新的学术方法，也没有设想出一种更为正确、公平和友善地对待和理解东方的立场、态度和方式。事实上，在那些激进地批判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西方学者身上，我们并没有较少地感受到按理说只能在那些被他们激烈地批判的前辈学人身上才能感受到的那种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气息。与秋风扫落叶般的解构相比，筚路蓝缕、一步一个脚印的建构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只能衷心期待那些彻底解构了其前代之学术的新权威们也能够为未来的学术和学术的未来着想，建设性地设定新的学术方向和方法；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带着他们一贯的批判精神，用心来体会一下以下这条我年少时曾经天天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也！”

迄今为止，已有一批萨义德式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们很彻底地解构了东方语文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令我们从此对自己曾经服膺的欧洲东方学传统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反感。可是，在东方语文学这个学术神话被破除之后，我们不得不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天我们到底应该采用哪一种更靠谱、更正确的学术方法来研究东方呢？与 Lopez《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这本书类似

¹ “Are We Prisoners of Shangrila? Orient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Tib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No. 1, October 2005, pp. 1-21.



的作品，我还读过不少，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梵文、印度学教授 Sheldon Pollock 先生曾以“深度东方主义”（Deep Orientalism）为题发表过长篇文章，批判和解构了可为欧洲语文学传统之典范的德国印度学研究，他把几代德国印度学家都毫不留情地指责为纳粹的走狗和帮凶，使得本来备受学界推崇的德国印度学研究一夜之间失去了昔日的光彩。¹所以，当 Pollock 近年来四出游说，呼吁世界学术要“重回语文学”时，有德国新锐印度学家站出来忿忿不平地发问：你[丫]到底想要我们回到哪个语文学？我告诉你吧，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语文学！²

让我们重新回到藏学这个主题上来！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正确和一致的学术方法，当下的国际藏学，看起来好像已经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没有大家都认同的学术分野、规范和标准，看似百花齐放，实则一盘散沙。可见，藏学和西藏一样，它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世外桃源，不是香格里拉。Lopez 们告诉我们藏学研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要去找寻或者构建一个香格里拉，可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西藏和藏传佛教才可以保证我们不再茫然陷入香格里拉这个囚牢。或许正因为 Lopez 们还没有为西方藏学家们设计出一种比语文学更可靠的学术方法，所以，这二十年间美国藏学研究似乎依然没有完全摆脱香格里拉的迷思和陷阱，我们大概也还不敢期待今天的藏学家们已经不再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

五、

如果我们可以把 Robert Thurman 和 Jeffrey Hopkins 二位先生确认为美国本土藏学研究传统的建立者的话，那么 Donald Lopez, Jr. 先生绝对是第二代美国本土藏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Lopez 无疑是一位世界级或者现象级的超级学霸，一般的美国教授出上两本书，拿到正教授职位就差不多已经走完了整个学术生涯，而 Lopez 即使在名满天下之后，依然被甲精进，笔耕不倦，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本或者二本新著出版，令世人惊艳和钦佩。从 Lopez 迄今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的大量著作中，我们或可窥见美国藏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及其鲜明特色，而仔细阅读他近二十年来的新作，则或可帮助我们观察和分析 Lopez 在犀利地解构了其前辈之藏学研究之后，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彻底摆脱了香格里拉的精神束缚，究竟有没有寻找到可以引领国际藏学走出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泥潭而得大自在的一条菩提大道。

Lopez 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细分成四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利用藏文翻译和藏传佛教上师所造诸释论，来研究印度佛教经院哲学，特别是大乘佛教哲学思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自续派[中观]研究》（*A Study of Svatantrik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87 / 2016）、《释心经：印度和西藏之诸释论》（*The Heart Sūtra Explained: Indian and Tibetan Commentaries*, SUNY Press, 1987）、《论空：心经之诸妙用》（*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 Uses of the Heart Sūtr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而目前他还在进行中的一个研究项目是翻译章嘉呼图克图乳贝多吉（*I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的一部教法源流。Lopez 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欧洲人与佛教交往的历史，研究佛教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发展出来的影响网络，以及从中被制造出来的那个被称为“现代佛教”的东西。他在这个领域的著作极多，前述他的那部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和他主编的那本《佛之主事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都属于他在这个领域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关于佛教与西方的交涉的研究，Lopez 很早就开始关心，早在 1987 年他就曾和他的同事编辑了一部由三位神学家和三位佛学家分别讨论基督和菩萨于各自宗教传统中之重要意义的论文集，题为《基督和菩萨》（*The Christ and the Bodhisattva*, SUNY Press, 1987）。此后，Lopez

¹ Sheldon Pollock, “Deep Orientalism? Notes on Sanskrit and Power Beyond the Raj,”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p. 76-133.

² Jürgen Hanneder, “‘Zukunftsphilologie’ oder die nächste M[eth]od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en*, 163, 1, 2013, pp. 159-172.



自己不断地回到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来，出版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佛教与科学：给困惑者的指南》（*Buddhism and Science: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西藏死亡书传》（*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A Bio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科学的佛陀：他的短暂和幸福的生活》（*The Scientific Buddha: His Short and Happy Lif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从石头到肉体：佛陀简史》（*From Stone to Fles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uddh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寻找基督佛陀：一位亚洲的贤者是如何成为中世纪的圣人的》（*In Search of the Christian Buddha: How an Asian Sage became a Medieval Saint*, with Peggy McCracke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妙法莲华经传》（*The Lotus Sūtra: A Bio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一位东方偶像的希有传奇：早期欧洲佛陀肖像集》（*Strange Tales of an Oriental Idol: An Anthology of Early European Portrayals of the Buddh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驱散黑暗：一位耶稣会士对西藏灵魂的追寻》（*Dispelling the Darkness: A Jesuit's Quest for the Soul of Tib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他甚至还和法国人类学学者 Katia Buffetrille 女士合作，将欧洲早期著名佛教研究大家 Eugène Burnouf（1801-1852）的《印度佛教史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翻译成英文出版。

Lopez 的第三个研究领域集中在他对二十世纪西藏最有名的知识分子、疯僧根敦群培（dGe 'dun chos spel, 1903-1951）的研究上。根敦群培于今已经是一个传奇，是当代神话西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被认为是西藏近代最著名的诗人、画家、散文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旅行家和情色专家，而 Lopez 可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研究根敦群培的头号专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有《疯子的中道：西藏僧人根敦群培对实性的反思》（*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在褪了色的智慧的森林中：双语版根敦群培诗 104 首》（*In the Forest of Faded Wisdom: 104 Poems by Gendun Chopel, A Bilingual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根敦群培：西藏的第一位现代艺术家》（*Gendun Chopel: Tibet's First Modern Artist*,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13）、《金颗粒：一位世界主义旅行家的传奇》（*Grains of Gold: Tales of a Cosmopolitan Traveler*, with Thupten Jinp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激情书：一部爱和性的藏文指南书》（*The Passion Book: A Tibetan Guide to Love and Sex*,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根敦群培：西藏的现代空想家》（*Gendun Chopel: Tibet's Modern Visionary*, Shambhala, 2018）等等。

Lopez 的第四个学术专注点是佛学研究的成果，通过翻译、编集论文集和参考书等，传送给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Lopez 既是一位极有学术眼光的佛教学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学术组织者，他在学术普及这个领域内所付出的努力，十分令人佩服，为佛教于西方的传播和佛教研究在西方教学和科研体系内的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Lopez 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一套《普林斯顿宗教读本》（*Princeton Readings in Religions*）丛书的总主编，其中由他本人实际主编的就有《实践中的佛教》（*Buddhism in Practice*, 1995/2007）、《实践中的印度宗教》（*Religions of India in Practice*, 1995）、《实践中的西藏宗教》（*Religions of Tibet in Practice*, 1997/2007）、《实践中的中国宗教》（*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1996）、《实践中的亚洲宗教：导论》（*Asian Religions in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1999）、《实践中的亚洲宗教：论集》（*Religions of Asia in Practice: An Anthology*, 2002）等等，每一本都是煌煌巨著，是现今美国大学宗教系、哲学系学生必备的重要参考教材。此外，Lopez 还和 Robert Buswell 教授一起编写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普林斯顿佛教辞典》（*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和 Jack Miles 先生合作编集了一部同样卷帙浩繁的《诺顿世界宗教论集：佛教》（*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Buddh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7)。除此之外, Lopez 还单独编写了多部面向大众的佛教普及读本, 例如《佛教: 导论和指南》(*Buddhism: An Introduction and Guide*, Allen Lane, 2001)、《一部现代佛教圣经: 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基楚读物》(*A Modern Buddhist Bible: Essential Readings from East and West*, Beacon Press, 2002)、《佛教经典》(*Buddhist Scriptures*, Penguin Classics, 2004)、《佛教故事: 它的历史和教法的简明指南》(*Story of Buddhism: A Concise Guide of Its History & Teachings*, HarperOne, 2009) 等等。Lopez 还编集了几部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的重要学术论文集,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部《佛之主事们: 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以外, 还有一部题为《佛教诠释学》(*Buddhist Hermeneu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的论文集, 也是一部于美国佛教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还有, Lopez 编集的《佛教研究关键词》(*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是西方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必备于案头的一部手册。Lopez 最近又出版了一部题为《惠照的旅程: 佛教的世界》(*Hyecho's Journey: The World of Buddh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的新书, 实在不知道应该把它归入上述四类著作中的哪一类。

综上所述, Lopez 著作、编集和翻译的作品有近四十种之多, 如此勤奋、高产的佛教学者恐怕是今世绝无仅有的, 这是他首先值得我们钦佩的超人般的卓越之处。Lopez 的著作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广泛, 无疑能帮助其学术同行们增长见识, 拓宽视野; 他讨论问题的视角是如此新颖、独特, 常常能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启发; 他的文风又是如此的激情和灵动, 似行云流水, 读来令人愉悦、舒畅。总而言之, Lopez 之学术人生的巨大成功绝非偶然, 他对国际藏学、佛学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理应得到世人的承认、欣赏和尊重。

然而, 若从学术史的角度专业地来评论他的这些作品的话, 我们或可以这样以为, 他的第一和第三类别的作品, 与传统藏学联系最为紧密, 但它们从内容到方法, 基本上都继承了被他严厉批评过的由其导师 Hopkins 所建立的美国本土藏学之学术传统, 反映出了“拜倒在喇嘛脚下”的那一代美国学者的典型学术风格, 其间充满了与欧洲藏学传统完全不同的鲜明的美国特色。若以学术言之, 则颇多语文学方面的瑕疵; 若以思想言之, 则很难说它们已经彻底跳出了香格里拉的陷阱, 不再为神话化藏传佛教背书了。

例如, 在 Lopez 这一系列与根敦群培相关的著作中,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疯子的中道》, 而该书的研究对象——《中观甚深要点集萃善说·龙树密意庄严》是最能体现根敦群培佛学思想, 且极富争议的吸睛式的中观论著。这部表面上看起来颇具颠覆性的论著, 常被后人用来当作证实根敦群培乃一位离经叛道的现代性先驱的一个证据。然而, 《龙树密意庄严》除了在写作风格上打破了藏土传统的造论模式外, 在内容和思想上却并没有什么新意, 其颠覆性实在无从谈起。论中所承继的仍然是宗喀巴之前宁玛、萨迦、噶举各派的“前期(中观)师”(snga rabs pa)之见地, 它无非是借对以格鲁派为代表的“后期(中观)师”(phyi rabs pa)的批判与讽刺来达成对“前期中观”的回归。Lopez 虽然也明确地点出了这一点, 但并没有将根敦群培放置在整个印藏中观学说的历史演进长河中加以考察, 并没有为读者梳理、呈现其中观思想的众多来源, 而这却恰恰是帮助读者穿过这位“中观犀利哥”天马行空的文字旋风、洞察其背后之根本立场所必需的。全书对根敦群培之前藏土早已存在的对格鲁派的批评只字不提, 却仅在翻译之余逐段提供辅助读者理解的复述式解读, 故很难说 Lopez 于此已跳出传统藏土注经模式的窠臼。此外, Lopez 对现代性的引入显得既无必要, 且缺乏说服力。书中的最后一章虽用大量篇幅来论述《龙树密意庄严》中所体现的现代性, 然却并未就具体的讨论对象为现代性给出明确而恰当的定义。而《龙树密意庄严》虽然行文风格自由且充满反讽, 但这并不足以支持 Lopez 书中提出的那些论点。总之, Lopez 有关根敦群培的这一系列著作并没有充分还原根敦群培所植根的宗教历史语境, 也未完全避免对根敦群培的增益与拔高, 相反, 它们在想象、偶像化和神化根敦群培的进程上, 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¹

第二种类的著作显然是 Lopez 之所有学术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也是他的学术中最精华、贡献最大的部分，但是，它们离传统藏学较远，它们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关联更为密切，而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依然还是他的那部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Lopez 的第四类作品都是关于佛教和佛学研究的通俗著作，它们对于当下西方学界之佛教知识的普及和佛教研究基本技能的培养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它们中的大部分同样亦与藏学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总而言之，虽然 Lopez 非常犀利地解构了以语文学为主导的欧洲藏学研究传统，同时也批判了在新时代运动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美国本土藏学传统，但是，他自己所做的藏学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背离美国本土藏学的传统，相反依然凸显出其鲜明的特色，Lopez 对藏学旧传统的激烈批判不过是他从事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一个重大创新和突破，在此之后，他并没有用心为藏学研究设计和指明一条在政治上能够彻底摆脱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在学术上既能够保持客观、理性，又鼓励批评、革新的正确道路。此外，不得不说的是，美国的本土藏学研究，确切地说是藏传佛教研究，本身就是新时代运动的产物，是美国思想、精神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近年来又通过 Lopez 的努力和成就，它与美国主流学术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密切了，或已成为美国主流学术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它与西藏、藏传佛教和传统藏学研究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远到了快摸不着边际的地步了。

六、

三十多年前，当我刚刚敲开藏学这扇沉重的大门时，门内还见不到很多美国藏学家的身影。当年人们提到美国藏学时，或许会说起那位英年早逝的 Turrell V. Wylie (1927-1984) 教授，他是图齐的学生，翻译了《世界境域志》，还确定了藏文拉丁转写的规则；²人们或许也会谈到旅美华裔学者李方桂 (1902-1987) 和张琨 (1917-2017) 二位先生，他们都在美国名牌大学内教学和研究藏语文，而李方桂用英文发表的对吐蕃金石、碑铭的研究文章，也在国际藏学界占一席之地。³那时 Lopez 才博士毕业不久，Hopkins 和 Thurman 二位先生或虽已崭露头角，但孤陋寡闻如我者对他们闻所未闻。

三十余年过去，这藏学世界已彻底改变了模样。面对眼前这新的景象，我常不由自主地要哼唱崔健的另一首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今天，Hopkins 和 Thurman 是美国本土藏学的泰山北斗，美国也早已是国际藏学重镇，其影响力与日俱增。事实上，美国藏学从来不只是被 Lopez 批判的、于此被我称为“美国本土藏学”这一种传统。美国藏学萌芽时期推崇的同样是欧洲的语文学学术传统，例如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开始的藏学研究都以欧洲传统为主导，以后在哈佛大学发展起来的藏学、印藏佛教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在 Thurman 主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和佛教研究，它也依然部分地保留着欧洲语文学的传统。及至今日，美国藏学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呈百花齐放的多元景象，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有可能从事西藏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各随其所擅学科而有不同的取径。但是，美国藏学的核心力量和最好代表无疑还是在近三十余年间由 Hopkins 和 Thurman 二位具有非凡人格魅力 (charisma) 的学

¹ 此段对 Lopez 《疯子的中道》一书的评论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杰博士添加，于此谨誌谢意！

² T. V. Wylie, "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2) p. 261-267; *The geography of Tibet according to the 'Dzam-gling-rgyas-bshad: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Roma: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62.

³ Fang-kuei Li,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 44, 1956, pp. 1-99. Fang-kuei Li, with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Special publications /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987.

术导师培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支美国本土藏传佛教研究队伍。他们人多势众，根深叶茂，不但占据了美国国内大部分的藏学学术平台，而且也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其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

就在这三十余年间，美国本土藏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和显著的变化。如前所述，Lopez 的学术既有对 Hopkins 之学术的继承，也有通过对它的反思和批判而获得的巨大进步。同样，Lopez 的同门晚辈或者他的弟子对他的学术也有继承和扬弃，也有变化和进步。就其总的趋势而言，美国本土藏学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在新时代运动背景下所做的佛教宣传和传播型学术发端，以后逐渐与美国式的宗教学或者比较宗教学学科的学术理念和规范相整合，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美国式的藏学道路。与美国主流学术的其它学科一样，至今美国的藏学研究一般都要强调所研究课题具有的问题意识，并要求对它的学术处理必须符合某种主流的学术范式。与此同时，美国藏学脱离了其最初那种制造新时代运动所需要的佛教读本的模式，加强了语文学的训练和对学术规范的要求，使其成为一门可被主流学术认可的学问。在比 Lopez 更年轻一代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中，有不少人写出了非常优秀的学术作品。例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 Bryan J. Cuevas 教授（Hopkins 的弟子）的《西藏死亡书秘史》、¹ 芝加哥大学的 Christian Wedemeyer 教授（Thurman 的弟子）的《为密乘佛教正名：在印度传统中的历史、符号学和违规》、² 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 Jacob Dalton 教授（Lopez 的弟子）的《伏魔：藏传佛教中的暴力和解脱》等等，³ 在我看来都是近年来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内出现的值得称赞的上乘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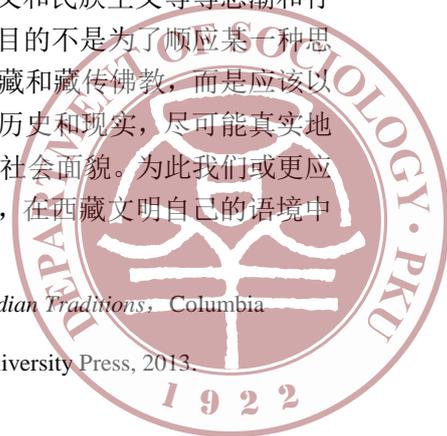
不知不觉间，进入藏学领域已经三十余年了。这么些年来，我对自己的最高期待从来不过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可今天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要达到这个起码的目标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流”不但是一个国际的“流”、一个世界的“流”，而且它也一直在变化、发展和进步之中。如前文所述，初入门时，我对东方语文学推崇备至，用心追摹，惟恐因自己驽钝而辱没了中德两家师门；后来读到 Lopez 等对东方语文学传统中的西方藏学研究所作的解构性的犀利文字，又觉得挺有道理，一度曾对语文学产生了怀疑。今天既喜读欧洲语文学家们凿凿有据的著作，也不烦读美国藏学家们激情灵动的作品，有时甚至很难确定自己到底更喜欢哪种风格的学术文章。我说我喜欢 Wedemeyer 的《为密教正名》，可听说有日本的佛教语文学说 Wedemeyer 的书不是 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而是 Making Non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我说我喜欢 Dalton 的《伏魔》，可有我十分佩服的英国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的权威亲口对我说 Dalton 书中对那些敦煌古藏佛教文献的解读错得实在非常离谱。可想而知，学术研究能在完美的语文学和启人心智的理论、思想之间达到一种有高度的平衡，世上大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的高手才能够做得到。今天国人喜谈学术要与国际接轨，我亦深以为是。可是，国际学术哪里只有一根正确的轨道等着我们去接呢？我与国际藏学打了三十余年的交道，到如今却越来越不明白中国藏学到底应该和哪根国际轨道接轨呢？做学问必须“预流”，这听起来不难，但真做起来可实在是一件让人终生必须十分努力地付出和学习的苦差使。

以上对近三十余年来美国本土藏学的管窥蠡测给我的一点启发是：藏学研究绝对应该回到西藏和藏学本身，它不应该是任何形式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思潮和行动影响下的一种关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话语和学术建构，藏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顺应某一种思想、政治、权力和利益而建构出一个人人们喜爱或者期待的、虚拟的西藏和藏传佛教，而是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带着批评的精神，来研读藏文文本，观察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和揭示西藏之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描述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面貌。为此我们或更应该回到起点，从刻苦学习藏语文开始，努力读懂不同形式的藏文文本，在西藏文明自己的语境中

¹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² *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Sem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in the Indian Tradi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2014.

³ *The Taming of the Demons: Violence and Liberation in Tibetan Buddh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来寻求正确理解藏文文献和西藏人文社会的方法，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对西藏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可以采用任何可取的学术方法，但是藏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正确理解，而理解必须从细致的语文学实践出发才有希望达成。

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喜欢崔健的歌，因为它让人在悲愤中依然坚持振作，在解构某种信念时还给人以升起另一种信念的希望，充满了正能量。三十年余间，我在藏学中学步，步履蹒跚，曾为我过去想象中的那座象牙塔和寻求中的那个香格里拉的崩塌和消逝而悲愤，但今天我依然对藏学之象牙塔和香格里拉的重建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光阴匆匆似流水，它一去不再回，不再有那痛苦的梦，和无用的忏悔。我要洗清身上的尘灰和脸上的泪水，我要骑在那骏马上，把时光紧紧追。”这是崔健《浪子归》的结尾，我听着觉得它催人振作，也给人以希望！

【论 文】

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证据¹

王振宇、顾昕²

摘要：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文章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中国 300 多个城市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率。在考察了测量指标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文章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的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上发现，一方面为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并衍生出新的学术课题和政策意涵。

关键词：族群多样性 经济增长 语言 投资 转移支付

一、引 言

族群多样性 (ethnic diversity)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近 20 年来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 (Easterly 和 Levine, 1997; 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 1999; Alesina 和 Ferrara, 2005)。在当今世界，族群多样性不仅呈现在国家层面 (单一族群国家早已不复存在)，而且也呈现在地区、社区 (社群)、组织甚至家庭之中。族群多样性通过族群认同等因素，引致偏好异质性，影响着个体的微观经济选择，进而对集体的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由长期的历史演进和融合，中国成为一个多族群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自 1950 年代起，识别并确认了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据绝对多数，而其他 55 个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此外，官方还确认有近 50 多个未识别民族。不同族群的人口不均衡地混居在不同的地方，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中国众所周知的贫困地区。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族群多样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会科学实验场。族群多样性如何影响各地的经

¹ 本文刊发于《财经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

² 王振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顾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经济增长？强化还是弱化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通过什么机制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和政策意涵。就学术意义而言，有关族群多样性与经济表现之关系的任何定律和机制，其普遍性均需受到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就现实政策意涵而言，其一，在中国政府强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彻底根除降低绝对贫困的公共政策背景之下，对族群多样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尤显急迫；其二，在中国“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研究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有关民族政策影响经济的途径的了解，并对症下药，促进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但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国内经济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很少。

本文开创性地在市级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族群多样性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控制了其他重要控制变量，考虑测量指标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本文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但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该结论有丰富的政策意涵，说明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推广普通话、有倾向性的公共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以及“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不仅在方向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力度上是有待加强的。此外，本文还在方法上作出了一些边际贡献。相较于 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 (1999)、Dincer 和 Wang (2011) 采用的似不相关回归 (SUR) 模型，本文采用的双向固定效应 (Two-way FE) 模型很好地解决了地区个体固定效应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而且，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法解决了既有文献未能处理好的内生性问题。

二、文献综述

Easterly 和 Levine (1997) 开创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领域。他们在这篇经典论文里分析非洲诸国经济增长低水平即“非洲增长悲剧”的原因时发现，族群多样性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表现负相关。学界的研究对象从非洲拓展到其他地区乃至全球。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 (1999) 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美国城市的经济表现有降低效应。Okediji (2004) 发现，种族/肤色及其教育差异对巴西各地区民众的收入增长潜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Dincer 和 Wang (2011) 以中国省级行政地区为分析单位，考察了族群多样性对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认为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增长率。

当然，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永远是负面因素。Alesina 和 Ferrara (2005) 指出，纽约和洛杉矶是族群多样性很高的两个美国城市，既有最多的种族关系麻烦，也维持了最高的文化创意和经济活力。他们构建了一个族群多样性成本收益的理论模型，认为族群多样性在对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会因能力、经验、文化的多元化带来某些私人物品产量的提升。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有益的作用，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更有可能呈现出来，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确认。Sparber (2009) 发现，那些依赖于决策创意和消费者服务体验的行业受益于种族多样性，而需要高水平团队努力的行业会因种族多样性而受损，这暗示了族群多样性所导致的高沟通成本可能对有效经济活动的开展带来负向影响。可以说，这为 Alesina 和 Ferrara (2005) 中建构的模型提供了一部分实证基础。

现有文献中关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探讨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既有文献对微观机制的考察主要是在公共经济学的视野之中，即认为高水平的族群多样性会引发政府失灵 (government failure)，尤其体现为诸多生产性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 (1999) 建立了一个偏好极化与公共物品提供模型，并据此使用美国城市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族群分化 (ethnic fragmentation) 程度越高的城市，其生产性公共物品 (如

教育、道路、排水和垃圾处理)提供的公共财政支出越少。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公共品集资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人投票模型,而是很大一部分来自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倾向性转移支付。毛捷、汪德华和白重恩(2011)的研究表明,中国实施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显著促进了民族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的相对提高和公共支出结构的相对优化。

文献对宏观机制的讨论集中在两块:第一是族群冲突及国家失败。很多跨国研究文献发现,族群多样性程度较高会提高族群冲突的概率,不利于政治稳定和政府施政,导致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从而对长期经济表现造成负面影响(Easterly 和 Levine, 1997; Rodrik, 1999; Elbawadi 和 Sambanis, 2002; Platteau, 2009)。第二是族群偏袒与腐败。相当一部分文献发现,族群分化度高的地方,寻租和政府腐败愈甚,而腐败在很多情况下会拉低经济增长(Shleifer 和 Vishny, 1993; Mauro, 1995; La Porta 等, 1997; Svensson, 2000; Cerqueti 等, 2012)。

总之,关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一些众所公认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学术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确认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是负面还是正面。绝大多数文献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降低效应,只有 Alesina 和 Ferrara (2005) 基于模型推演认为族群多样性亦有可能对经济表现有提升效应。总之,有关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确认。第二个挑战在于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族群多样性与经济表现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reversal causality)问题不可忽略;另一方面,遗漏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s bias)的问题也很重要。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是否构成一个新的、独立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抑或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所显示出来的影响只不过是已知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投射而已?第三个挑战在于发现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表现的机制。族群多样性作为一种社会因素,传导到经济表现,可以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认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找到可能的分析路径。对增长经济学家来说,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在于要素投入的水平,其中包括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变革增速和企业家创新的蓬勃(Aghion 和 Howitt, 2009)。如果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确有影响,那么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其效应是通过影响哪种要素投入水平而确立的?

直面上述挑战,本文参照 2010 年中国行政区划,以 346 个城市(包括地级市、直辖市和省直辖市)为分析单位,以民族作为族群的划分依据,考察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相较于 Dincer 和 Wang (2011) 以省为单位进行的研究,本文认为,市级是更合适的衡量经济集聚和人群交往的地理单位,以市级为单位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健的发现。关于中国各族群人口的居住和工作地点数据,目前最具系统性的可获得资料是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相较更早的第三次(1982 年)和第四次(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优点是提供了城市层面详细的族群数据。利用该数据,本文构建了城市级别的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并实证分析了其对 2000-2013 年各市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三、理论假说、数据描述、实证结果、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

(一) 理论假说。大部分文献支持族群多样性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并在跨国研究和国别研究中得到了实证支持。微观机制的探讨涉及有沟通交流成本、认同信任、合作冲突和公共物品供给。宏观机制的探讨涉及有族群冲突导致的政治不稳定和执政者庇护自身族群所诱发的腐败。当然,由于文化与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等原因,族群多样性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以及上述机制在中国并非成立。基于对中国的考察,我们提出以下假说,并在后面的实证部分中加以检验:

主假说 1a: 在中国,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城市,人均经济增长率更高。



尽管跨国和其他国别研究未得出类似结论，但以下理由仍对这个假说提供有利支持。一方面是文献综述提到的，不同族群能力、经验、文化的多元化可能促进行业创新，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旅游和服务经济；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倾向性政策，使得族群多样性地区可能得到了更多的公共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毛捷、汪德华、白重恩，2011）。

主假说 1b: 在中国，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城市，人均经济增长率更低。

至少两个理由会为这个假说提供有利支持。一是族群多样性也伴随着语言的多样性，导致较高的沟通交流成本。二是族群多样性可能降低私有部门的投资率。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和认同问题，可能导致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有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益率。作为趋利避害的理性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的投资。对这一相关性，国际文献有一些证据予以支持（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 1999; 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 2005），但在中国，这仍有待验证。

分假说 2: 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语言多样性更高（或者说语言沟通成本更高）。

在中国，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日常使用语言（或方言），这可能导致族群多样性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尽管汉字和普通话分别是全国通行的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但法律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语言的合法权利，除汉语外，被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 100 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2012）。而且，在很多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和语言拥有同样的官方地位。来自“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显示，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8 个少数民族能用汉语与人交谈的比例在 50% 左右或以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所以，有理由认为，族群多样性增加了语言沟通成本。

分假说 3: 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私有部门投资率更低。

在中国，族群多样性可能降低私有部门的投资率。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语言沟通成本更高，这可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导致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有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益率。作为趋利避害的理性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的投资。对这一相关性，国际文献有一些证据予以支持（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 1999; 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 2005），但在中国，这仍有待验证。

分假说 4: 族群多样性对公有部门投资率影响不确定。

公有部门的投资，既有追求盈利性的产业投资，也有不追求盈利性的基建投资和承担减小区域差距功能的公共物品投资。所以我们预期，族群多样性对公共部门投资率影响不确定。

分假说 5: 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人均中央转移支付越多。

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是随着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建立起来的，是财政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以期能够实现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地方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均等化。在中国“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对民族混居地区的财政倾斜。毛捷、汪德华和白重恩（2011）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在相关研究中，族群多样性的划分依据有多种，包括语言、肤色、种族、宗教等（Alesina 等，2003）。具体到中国，我们沿用 Dincer 和 Wang（2011）的做法，采用以民族作为族群划分依据的做法。

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地理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宏观上看，各民族分散在各省区市，混合居住；微观上看，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在一县甚至一乡。不同民族在各地方的混居程度有很大差异。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以广东省梅州市为例，常住人口的 99.95% 都是汉族，单一民族绝对主导；而在云南省普洱市，常住人口中汉族占 39.0%，哈尼族占 17.9%，彝族占 16.6%，拉祜族占 12.0%，佤族占 5.9%，傣族占 5.7%，其他少数民族共



同占 2.9%，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占据多数。因此，中国各地族群多样性的差异，为我们检验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各种理论提供了基础。

以 2010 年的地级行政区划为标准，本文在 333 个地级行政单位的基础上，加入了 4 个直辖市，以及河南省济源市，湖北省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神农架林区，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等 9 个省属直辖行政单位，共计 346 个行政单元，下文统称为“各市”。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各市的族群多样性。在查阅了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后，我们发现，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 年）提供了市级的各民族人数详细统计。此外，2005 年底，全国还进行过 1% 人口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样本量为 1705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31%。”¹由于抽样方法设计科学合理，我们认为可以利用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计算 2005 年各市的族群多样性。

关于族群多样性的最常用的指标是族群分化指标（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最早被 Mauro（1995）使用，其现实含义为人群中任意两个人属于不同族群的概率。族群分化指标计算方法如下：用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除以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占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s_{ji} ，该变量也等于在 i 地区全体人口中随机抽查一人时他恰好为 j 族群的概率。按式（1）计算出的 EFI_i 则可以表示该地区任意两个人来自不同族群的概率。 EFI_i 的取值范围为 0-1，值越大就表明该地区族群越分化，通俗说也就是族群多样性越高。

$$EFI_i = 1 - \sum_{j=1}^N s_{ji}^2 \quad (1)$$

我们可以描述以族群分化指标（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平均）表示的族群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图略）。族群分化指标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族群分化指标	936	0.148391	0.206994	0.000149	0.782218
人均 GDP 增长率	1 007	0.118841	0.029031	-0.01104	0.240542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对数值）	1 001	9.280289	0.855512	7.095064	11.80829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1 020	0.554849	0.252287	0.097829	2.528731
人均受教育程度	932	7.969251	1.313125	1.734987	13.14028
外贸依存度	1 021	0.2022666	0.440016	0	6.901223
城镇化率	1 029	0.4265144	0.188457	.0602212	1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1 038	0.089595	0.285739	0	1
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1 038	0.153179	0.360334	0	1
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	1 038	0.135838	0.342782	0	1

与族群分化指标的数据年份保持一致，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各市经济增长率，我们采用 2000 年之后，最新到 2013 年的数据。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可以得到各市 2010-2013 年的人均 GDP 增长率。

根据人均 GDP 增长率（2000-2013 年平均）的空间分布（图略）可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并不明显比其他地区低。实际上，本文后面表 2 和表 3 的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其他因素后，越是初始人均产出水平低的地区，反而经济增长率越高。

¹ 出自《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06-03-16。



表 2 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			
	(1) OLS	(2) One-way FE	(3) RE	(4) Two-way FE
族群分化指标	-0.0123** (0.00545)	-0.0741** (0.0360)	-0.0130** (0.00545)	-0.0947** (0.0393)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0.00186 (0.00210)	-0.0102** (0.00431)	-0.00234 (0.00212)	-0.0402*** (0.00785)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0.0380*** (0.00596)	0.0817*** (0.0102)	0.0399*** (0.00597)	0.0659*** (0.00932)
人均受教育程度	0.000499 (0.00153)	-0.00894*** (0.00223)	0.000229 (0.00152)	-0.00596** (0.00242)
外贸依存度	-0.00325 (0.00281)	-0.00198 (0.00510)	-0.00291 (0.00287)	0.000490 (0.00508)
城镇化率	0.0267** (0.0110)	0.0583** (0.0226)	0.0295*** (0.0110)	-0.00733 (0.0214)
省会城市	0.0125*** (0.00342)		-0.0125*** (0.00344)	
沿海城市	0.00179 (0.00251)		0.00187 (0.00251)	
资源型城市	0.00432 (0.00275)		-0.00435 (0.00275)	
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0.102*** (0.0157)	0.224*** (0.0269)	0.106*** (0.0158)	0.489*** (0.0700)
Observations	911	911	911	911
Adjusted R-squared	0.129	0.300		0.428

注：括号内参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下表同。

图 1 为各市人均 GDP 增长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 GGDP)和族群分化指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 EFI)的散点分布图以及拟合线。由拟合线可知,族群分化指标变动量和人均 GDP 增长率变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系。图 2 是分地区的族群分化指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 EFI)和人均 GDP 增长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 GGDP)的均值柱状图。由图 2 可见,西部地区和中部的平均 Δ EFI 是负值,平均 Δ GGDP 是正值,这说明,西部和中部地区从 2000-2010 年的族群多样性在减小,而人均 GDP 增长率在增大;东部地区的平均 Δ EFI 是正值,平均 Δ GGDP 是负值,这说明东部地区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的族群多样性在增大,而人均 GDP 增长率在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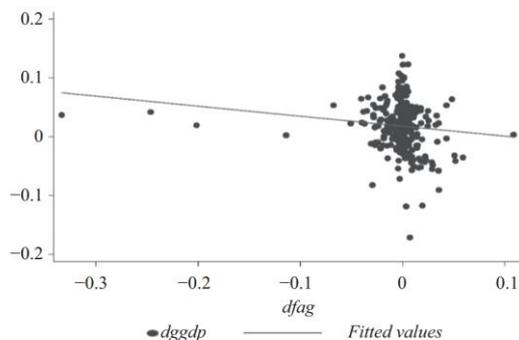


图 1 Δ GGDP 与 Δ EFI 的散点图与拟合线



图 2 分地区的 Δ EFI 和 Δ GGDP 均值柱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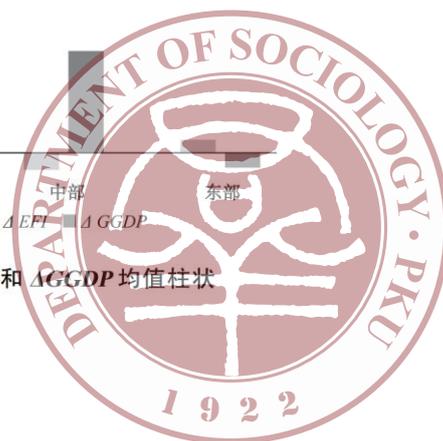


图 3 和图 4 的基本结论似乎更支持理论主假说 1b。但要想系统地证实主假说 1b，或者证伪主假说 1a，仍需下文进行细致的模型计量和检验。

参照 Alesina 等（2003）等的处理，考虑到族群多样性数据只有 3 年，而经济增长率数据有 14 年，我们将 2000-2013 年分为三期：2000-2004 年为第一期，2005-2009 年为第二期，2010-2013 年为第三期。这样，每期的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率数据都有变化。

除了使用族群多样性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外，我们还添加了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参照 Dincer 和 Wang（2011）的处理，并参考其他关于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们添加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和城镇化率。另外，还添加了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城市虚拟变量和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¹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采用每期前一年（分别为 1999 年、2004 年、2009 年）各市的人均 GDP 数据的对数值来衡量。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根据现有经验实证研究，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越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与总 GDP 的比例来衡量，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这一指标可用来表示新增实物资本投入，水平越高则经济增长越快。受教育程度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本身提供了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详细人数统计，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也提供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所占比重。由此可计算出三个不同年份各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总额与总 GDP 的比例来衡量。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该市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自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表 1 为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初始人均产出水平为每期前一年数据，族群分化指标、人均受教育程度为每期第一年数据，人均 GDP 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均为各期数据的平均值。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利用三期不同的横截面数据构建面板数据，由此将主要使用面板估计模型来估计中国各市的族群多样性对人均 GDP 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将分别报告并比较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混合模型的回归结果。以下为固定效用模型的回归方程：

$$\text{GDPGrowth}_{it} = \alpha + \beta \text{EFI}_{it} + \mathbf{X}_{it} \Psi_i + z_i \delta + \gamma 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i 为不同的城市，t 为不同的时期， GDPGrowth_{it} 为不同城市各期的平均人均 GDP 增长率； EFI_{it} 为不同城市各期的族群分化指标， \mathbf{X}_{it} 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人均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等， z_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如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城市虚拟变量、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和其他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遗漏变量）。 u_i 和 ε_{it} 为复合扰动项； β 度量族群多样性影响人均 GDP 增长率的程度， α 为常数项。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这里我们分别展示了混合模型（OLS）、单向固定效应模型（One-way FE）、随机效应模型（RE）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E）的回归结果。F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用模型比混合模型更适用。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用。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2 中第 4 列回归结果所示，族群分化

¹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确定了富含矿产资源的 4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资源型城市。这 47 个城市分别是大庆、盘锦、东营、濮阳、克拉玛依、唐山、邯郸、邢台、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乌海、赤峰、抚顺、阜新、辽源、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淮南、淮北、萍乡、枣庄、平顶山、鹤壁、焦作、广元、达州、六盘水、铜川、石嘴山、葫芦岛、铜陵、白银、金昌、本溪、马鞍山、郴州、攀枝花、白山、松原、伊春、黑河和云浮。



指标的回归系数为-0.0947，且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¹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分化指标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这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主假说 1b。

(四) 稳健性检验。这里，我们将换用族群多样性的另外一种度量，来检验表 2 中回归结论的稳健性。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 (2005) 构建了一种新的指标——族群极化指标 (ethnic polarization index) 来衡量族群多样性，其现实含义为人群中不同族群两极分化的程度。其计算方法为：用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除以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占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s_{ji} ，该变量也等于在 i 地区全体人口中随机抽查一人时他恰好为 j 族群的概率。按式 (1) 计算出的 EPI_i 表示该地区的族群极化指标。 EPI_i 的取值范围为 0-1，值越大就表明该地区族群极化程度越高。

$$EPI_i = 1 - \sum_{j=1}^N \left(\frac{0.5 - s_{ji}}{0.5} \right) \quad (3)$$

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 (2005) 认为，族群极化指标和族群分化指标的共同点在于，同样可以很好地衡量族群多样性，实证上同样显著降低经济增长；不同点在于，增加社会冲突是族群极化指标降低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而族群分化指标和社会冲突关系不明显。

以族群极化指标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三年平均) 表示的族群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族群极化指标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族群极化指标	936	0.239079	0.30406	0.000277	0.996555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我们同样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4 中第 4 列回归结果所示，族群极化指标的回归系数为 -0.0575，且能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不变，族群极化指标越大，经济增长率越低。虽然回归系数相比表 2 中第 4 列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而且显著性有所下降，但这仍支持了表 2 回归的基本结论，主假说 1b 成立。无论以族群分化指标还是族群极化指标度量，族群多样性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

表 4 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			
	(1) OLS	(2) One-way FE	(3) RE	(4) Two-way FE
族群极化指标	-0.00823** (0.00358)	-0.0342 (0.0338)	-0.00869** (0.00359)	-0.0575* (0.0300)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0.00188 (0.00210)	-0.0101** (0.00433)	-0.00235 (0.00211)	-0.0403*** (0.00787)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0.0380*** (0.00593)	0.0818*** (0.0103)	0.0398*** (0.00594)	0.0659*** (0.00930)
人均受教育程度	0.000549 (0.00152)	-0.00894*** (0.00224)	0.000289 (0.00150)	-0.00589** (0.00245)
外贸依存度	-0.00342 (0.00281)	-0.00181 (0.00518)	-0.00309 (0.00287)	0.000554 (0.00514)
城镇化率	0.0272** (0.0110)	0.0589** (0.0229)	0.0300*** (0.0111)	-0.00561 (0.0217)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0.0124*** (0.00344)		-0.0124*** (0.00346)	

¹ 考虑到媒体披露的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辽宁首次公开确认: 2011 年至 2014 年经济数据造假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8/c_1120331628.htm), 我们在删除辽宁省样本后, 重新进行了回归。除了系数有微小变化后, 回归结果几乎完全不变。限于篇幅, 删除辽宁后的回归不在此汇报, 下同。



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0.00191 (0.00252)		0.00199 (0.00253)	
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	-0.00422 (0.00277)		-0.00423 (0.00277)	
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0.101*** (0.0155)	0.220*** (0.0275)	0.106*** (0.0156)	0.488*** (0.0702)
Observations	911	911	911	911
Adjusted R-squared	0.129	0.299		0.426

(五) 内生性问题讨论。实证结果和稳健性分析都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主假说 1b，而否定了主假说 1a。即其他条件不变，各市族群多样性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尽管以上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最大可能地解决了遗漏变量问题，但我们仍需关注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问题。因为，不仅族群多样性可以影响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经济增长率反过来也会影响族群多样性，即经济增长快速地区会通过增加对移民的吸引而推高族群多样性。

为了克服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实现更清晰的因果识别，本文采用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族群多样性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重新考察族群多样性对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使用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依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表 5 中第 2 列回归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在控制了省会城市等变量后，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仍对族群多样性有很强的正向解释力)，这是由各民族人口在历史上的分布和迁移所决定的。多民族高度混居的地方往往远离省级行政中心。计量分析表明，民族自治州是多民族高度混居的地方(民族自治州虚拟变量与族群多样性高度正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883，显著水平为 0.0000)，而且民族自治州虚拟变量与各市到省会的距离显著正相关(二者相关系数为 0.1485，显著水平为 0.0000)。

表 5 工具变量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SLS 因变量： 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	(2) IV 因变量： 族群分化指标
族群分化指标		
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上述指标的工具变量)	-0.0858** (0.0337)	0.00021*** (0.0000473)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0.00619** (0.00311)	-0.0483*** (0.0147)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0.0499*** (0.00858)	0.140*** (0.0388)
人均受教育程度	-0.00103 (0.00147)	-0.0209** (0.00862)
外贸依存度	-0.00238 (0.00267)	0.0134 (0.0114)
城镇化率	0.0360*** (0.0111)	0.0999 (0.0618)
省会城市	-0.0120*** (0.00342)	0.0526** (0.0213)
沿海城市	-0.000882 (0.00297)	-0.0389** (0.0161)
资源型城市	-0.00755** (0.00311)	-0.0424*** (0.0157)
Observations	911	911
F-stat on IV		19.7126

第二，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和各市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各市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变动很大，但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则是固定不变的外生地理变量。尽管各市到省会城市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省会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但更多是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而非经济增长率。相关性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与人均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极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关系数为-0.0038，显著水平为 0.9053)。

表 5 展示了工具变量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第 2 列可以看出，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与族群分化指标高度相关，回归系数为正，且能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该工具变量 F 检

验的结果是 19.7126，因此不是弱工具变量。第 1 列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显示，族群分化指标回归系数为 -0.0858，且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变量内生性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该工具变量是非时变的，所以这里识别的是组间效应，而非组内效应。

由上分析可知，理论主假说 1b 得到了支持，而理论主假说 1a 被否定。

四、影响机制：语言沟通成本、私有及公有部门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

这里将对族群多样性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理论假说部分提到，在中国，高的族群多样性可能通过两个机制，语言沟通成本和私有部门投资，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可能通过另外两个机制，公有部门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缓解了这种负向影响。我们分别对这四个机制（分假说 2、3、4、5）进行检验。

（一）语言沟通成本。在中国，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日常使用语言（或方言），这可能导致族群多样性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尽管汉字和普通话分别是全国通行的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但法律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语言的合法权利，除汉语外，被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 100 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2012）。而且，在很多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和语言拥有同样的官方地位。来自“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显示，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8 个少数民族能用汉语与人交谈的比例在 50%左右或以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我们从《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中搜集整理了全国 346 个市所各自包含的方言片区数据（既包括汉语方言、也包括少数民族方言）。对市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族群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之间显著且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 0.585，显著水平为 0.000）。徐现祥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以方言种类表示的语言多样性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负向关系。那么，语言多样性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率吗？

表 6 展示了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6 第 3 列显示，在控制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人均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城市虚拟变量、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后，方言多样性的回归系数为-0.000883，且能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语言沟通成本显著降低了地方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语言沟通成本的增加是族群多样性降低地方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机制。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对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正效应，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待加强的。分假说 2 得到了支持。

表 6 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语言沟通成本对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VARIABLES	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2000-2013 年）		
	(1)	(2)	(3)
方言多样性	-0.000912*** (0.000278)	-0.000875*** (0.000279)	-0.000883*** (0.000308)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0.00780*** (0.00256)	0.00711*** (0.00265)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0.0188*** (0.00715)	.0216*** (0.00656)
人均受教育程度		0.00237* (0.00134)	.00873*** (0.00207)
外贸依存度		-0.00435* (0.00263)	0.00147 (0.00244)
城镇化率		0.0269*** (0.0102)	-0.000681 (0.0104)
省会城市			0.0105*** (0.00346)
沿海城市			0.00150 (0.00291)
资源型城市			0.00240 (0.00244)
是否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常数项	0.123*** (0.00142)	0.150*** (0.0224)	0.0615** (0.0263)
	344	336	336

Observations	0.028	0.088	0.445
Adjusted R-squared			

(二) 私有及公有部门投资。由于市级私有和公有部门投资数据尚不可得，这里仅提供省级数据分析的结果。通过《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我们查找到历年各省按经济类型细分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将其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归并为“公有部门”，将其中的“私营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其他经济”归并为“私有部门”，这样可以计算出历年各省 2010 年到 2014 年“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本文构建面板数据，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族群分化指标对各省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及公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影响。另外，由于全部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有市级数据，也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族群分化指标对各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影响。

由表 7 第 2 列可见，控制了人均经济产出水平、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族群分化指标显著降低了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回归系数为 -0.996，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表 7 第 3 列可见，族群分化指标对公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没有显著影响。由表 7 第 1 列可见，族群分化指标显著降低了全部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回归系数为-0.525，能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比这三列结果，我们能得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族群多样性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而对公有部门投资率没有影响。族群分化指标对全部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降低效应，主要是通过私有部门发挥影响的。分假说 3 和分假说 4 得到了支持。

表 7 族群多样性对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VARIABLES	(1)全部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市级数据)	(2)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省级数据)	(3)公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省级数据)
族群分化指标	-0.525* (0.290)	-0.996** (0.426)	-0.0161 (0.360)
人均经济产出水平	-0.0427 (0.0421)	0.0528 (0.0883)	0.0310 (0.0478)
是否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地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	0.807** (0.357)	-0.0878 (0.775)	-0.0261 (0.426)
Observations	924	93	93
Adjusted R-squared	0.671	0.807	0.081

族群多样性为什么会降低私有部门投资？我们将其解释为，高族群多样性导致人群之间语言沟通成本更高、认同信任更低、合作更少。这些可能导致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益率。因此作为趋利避害的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高族群多样性地区的投资。而族群多样性对公有部门投资率没有影响也是合理的。公有部门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考量而且承担了减小区域差距的功能，不像私有部门那样趋利避害，对不利的投资条件也没有那么敏感。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降低私有部门投资是族群多样性降低地方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机制，而族群多样性不影响公有部门的投资率。换言之，相较于私有部门投资，公共部门投资或政府主导的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公共投资政策，起到了促进民族平等和减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

(三) 中央转移支付。和投资数据类似，由于市级的中央转移支付数据不可得，这里仅提供省级数据分析的结果。通过《中国财政年鉴》中的历年各省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的“中央补助收入”一项除以各省当年人口总数，可得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本文构建 31 个省级单位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年度的面板数据，用不同的模型来估计族群分化指标对各省人均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F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用模型比混合模型更适用。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用。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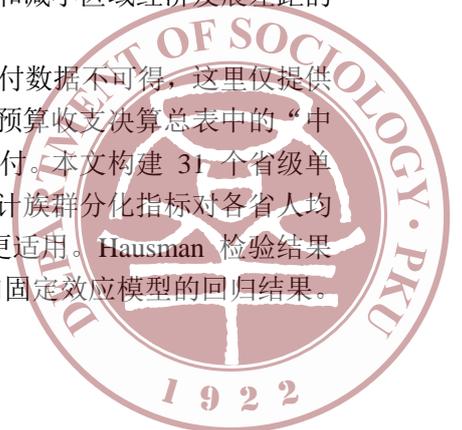


表 8 族群多样性对人均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

VARIABLES	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1) OLS	(2) One-way FE	(3) RE	(4) Two-way FE
族群分化指数	3 320*** (1,103)	30 128 (18,990)	4 435*** (1,078)	31035** (14,239)
人均经济产出水平	1 168*** (235.9)	2 436*** (384.3)	1 827*** (266.5)	1 546 (1,023)
是否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9 789*** (2,357)	-26 904*** (6,802)	-16 276*** (2,396)	-19 061** (8,903)
Observations	88	88	88	88
Adjusted R-squared	0.145	0.572	0.572	0.585

由表 8 第 4 列回归结果可见，族群分化指标的回归系数为 31 035，且能通过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在控制了人均经济产出水平、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族群分化指数越高，人均中央转移支付越高。族群分化指数每提高 0.1，该地能多得到人均 3 103.5 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分假说 5 得到了支持。这表明，中国的转移支付政策的确对多民族地区有倾向性，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促进了民族和地区之间经济平等。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文基于第五次（2000 年）、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 346 个城市的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开创性地从城市层面考察了中国的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探求了族群多样性影响市级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均受教育程度、贸易依存度、城镇化率等变量，以及控制了各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最大程度地解决了遗漏变量问题后，以族群分化指标衡量的族群多样性仍显著降低了地方人均经济增长率。在使用族群极化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和采用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族群多样性的工具变量以消除变量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这一发现，确认了国际文献关于族群多样性经济降低效应的命题在中国也是成立的。这说明，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因素，族群多样性的确对经济表现有独立的影响，这一发现对丰富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理论有所助益。通过对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机制的探讨，我们进一步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暂时的不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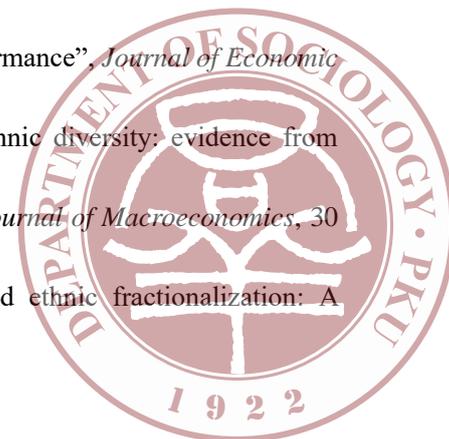
本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族群多样性会显著降低地方经济增长，但其负面效应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制度或政策变化的。事实上，Alesina 和 Ferrara（2005）已表明，包容的社会体制有利于降低族群多样性的负面经济影响。本文机制部分的探讨，也为政府通过民族政策、语言政策、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消除这一效应提供了思路。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平等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倾斜性政策，以及推行双语政策以普及普通话等，都可以减少因族群多样性造成的沟通和信任问题，减少各族群之间经济交易的成本，降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我们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公有部门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为了提升多族群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一方面应该着力加大公有部门的投资来弥补私有部门投资的短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

强公共部门投资以鼓励旅游业、休闲业、文化业等领域的发展，以发挥多族群创意优势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以及限于篇幅未能细致探讨的地方，将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性研究：第一，从行业水平上考察族群多样性对创新的促进和对经济的正向作用；第二，度量各地包容性民族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效果，并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族群多样性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三，考察族群多样性与民族聚居区特色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这几个方面，既有理论贡献，也具有极强的公共政策意涵。最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无论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结构、制度结构还是文化结构，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课题。具体到族群多样性这一结构性因素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有相当多未知的领域有待探索，有待更多、更细致的理论建模和计量分析。

参考文献：

- [1]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界定与分类”，《宏观经济研究》2002（11）：37-39.
- [2] 毛捷、汪德华、白重恩，“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公共支出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经济研究》2011，（S2）：75-87.
- [3] 王振宇，顾昕，“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国际文献综述”，《制度经济学研究》2016（4）：1-15.
- [4]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 2015，“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2015（2）：1-32.
- [5] 郑长德、单德朋，“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综述”，《民族学刊》2011，（3）：50-61.
- [6] 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辑委员会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8]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
- [9] Aghion P, Howitt P. 2009, *Economics of Growth*. MA: The MIT Press.
- [10] Alesina A, Özler S, Roubini N, et al. 1996,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 (2): 189-211.
- [11] Alesina A. 1999, “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isions”, *Scholarly Articles*, 114 (4): 1243-1284.
- [12] Alesina A. 2000, “Participation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3): 847-904.
- [13] Alesina A, Baqir R, Hoxby C. 2002,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3): 229-233.
- [14] Alesina A, Devleeschauwer A, Easterly W, et al. 2003,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 (2): 155-194.
- [15] Alesina A, Ferrara E L. 2005,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3 (3): 762-800.
- [16] Alesina A F, Gennaioli C, Lovo S. 2015, “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ersity: evidence from deforestation in Indonesia”, NBER Working Papers.
- [17] Bridgman B. 2008, “Why are ethnically divided countries poor?”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30 (1): 1-18.
- [18] Cerqueti R, Coppier R, Piga G. 2012, “Corruption, growth and 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 153-181.



- [19] Detotto C, Otranto E. 2010, "Does crime affect economic growth"? *Kyklos* 63 (3): 330-345.
- [20] Dincer, Oguzhan C. 2011,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14 (1): 1-10.
- [21] Habyarimana J, Humphreys M, Posner D N, et al. 2007, "Why does ethnic diversity undermin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 (4): 709-725.
- [22] Platteau J P. 2009,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o Af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e, ethnicity, and custo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1 (3): 669-689.
- [23] Sparber C. 2009, "Racial diversity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in US industries: 1980-2000",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5 (3): 829-856.
- [24] Tangerås T P, Lagerlöf N P. 2009, "Ethnic diversity, civil war and redistribution",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 (1): 1-27.

【论 文】

从边缘参与主流：滇南孔姓彝族姓名符号研究¹

彭秀祝²

【摘要】 姓氏是家族维护血缘系统的文化符号。按字辈取名是以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亲亲”原则为基础，借以建立长幼秩序和明辨孝悌之义的重要方式。明清以来，儒家文化在向西南边疆地区传播过程中，汉姓和字辈也常被少数民族借用，成为他们可资利用的文化符号。滇南彝族的“改孔姓”和“按字辈取名”个案表明，身处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同样有参与主流文化的意愿。我们应关注他们如何主动采借儒家文化，为自身发展提供新动力，而非将其简单置入“冲击—回应”框架之中予以解释。

【关键词】 姓氏；孔姓彝族；字辈；文化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的姓名是建立在实践和认知基础上的分类系统^{[1] (1)}，命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操作，也是对社会成员的实际控制^{[1] (98)}。中国人的姓名常包含姓、字辈、名等元素，姓氏是家族血缘的象征，字辈则是秩序的标识^[2]。

滇南地区的孔姓彝族主要分布于建水、石屏和元阳等地。明朝以来，随着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治理，并兴修文庙，传播儒家文化。孔子在此过程中被推崇，地位渐高，甚至有彝族人将其视为“汉佛”^[3]。“崇儒”“尊孔”的观念还折射到彝族群体“改姓”和“借用字辈谱”现象上。这是面对儒家文化冲击而做出的被动回应，还是主动利用儒家文化外壳满足自身需求，进而参与主流文化？这成为本文的基本问题。

“冲击—回应”说源自费正清《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一书，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惰性，经历西方强烈的冲击后，其原有的结构才能被打破，进而走向西方工业化之路^{[4] (1~2)}。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一书中对这一解释框架做出了批判，他认为“‘冲击—回应’框架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就很容易鼓励人们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

¹ 本文刊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第2期。

²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反应”^{[4] (55)}。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中，西方文化总是占主导地位，被视为东方文化的“导师”^[5]，中国社会自身的诉求与能动性被忽略，这种观点事实上与“华夷之辨”如出一辙。

在中国西南山地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研究中，很多学者带有“冲击-回应”分析思路。詹姆士·斯科特认为，随着中国国家控制区域扩大，处于边缘的人或被汉化，或迁移^{[6] (27)}。马健雄关注中国西南国界形成过程中土著居民如何面对国家的压力，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反应^{[7] (1)}。不论是反抗还是回应，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被动地位。马翀炜认为，作为山地少数民族群的农民并非天然具有反国家化的冲动，相反，他们将国家视为可资利用的工具，用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资源来为自身构建更多的社会资本^[8]。具化到彝汉关系研究上，方国瑜认为，彝族的生产关系在汉族移民进入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旧有的制度也随之改变^[9]。林超民也指出，汉文化的传播使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变革^[10]。显然，他们认为，彝族社会是受到汉族移民和儒家文化的冲击之后才发生剧烈变化，然而，孔姓彝族的个案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视角：处于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并非都是在汉文化剧烈冲击下而做出被动回应，他们也有主动学习汉文化、从边缘参与主流文化的意愿。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西南边疆族群文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蛮荒”与“邹鲁”

在中国语境中，边疆与民族是可以互为隐喻的^[11]。传统“天下观”有对边疆的强调。“天下观”内部有很明显的边界，即儒家文化与非儒家文化，或礼仪之邦和蛮夷之地的区分^[5]。而这样的边界存在也形成了“主流”与“边缘”之分，两者的对峙则是通过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得以表达。通常，“边缘”有两种意指：一是地理上远离中原的偏远地区；二是人的层面，即生息于斯的人有着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文化特质。“边缘”不仅指地域，也带有“贫困”“蛮荒”等文化层面的隐喻。

滇南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族群众多。元代之前，该地区常被统治者视为蛮夷聚集的“极边”之地而疏于管理。《滇志·地理志》记载：“建水州，唐为乌么蛮地，接壤交趾，为云南极边。”^{[12] (56)}生活于此的人也被视为难以怀柔之“蛮夷”，如《滇志·羁縻志》这样写道：“诸甸皆藏匿山林，群聚杂处，喜人怒兽，一言不合，则机弩引弓相向，死则以财物偿之，非德化所能怀柔”^{[12] (977)}。即便王朝统治深入其中，仍有鞭长莫及之感，“惟是流官惮瘴，久不履其地，诸酋不袭而自冠带”^{[12] (110)}。

明代以来，统治者重视在滇南地区传播儒学，将之视为“用夏变夷”的重要手段。建水、石屏地区每年春秋祭孔，宣扬儒学，文教之风盛行，“士秀而文，崇尚气节”^{[12] (110)}，当时的统治者将这一变化归功于教化，“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13] (699)}。儒家文化的传播对当地的风俗产生了很大影响，礼教渐渐被人们所接受。《滇志·学校》载：“万历三年，知府昌应时建云路坊于泮池南，表曰‘滇南邹鲁’。”^{[12] (304)}这说明明中后期，建水一带儒家文化氛围之浓厚。

三、姓氏的选择

国内外姓孔之人多认同孔子为其祖先，然而，并非所有姓孔之人均为孔子后裔。顾炎武就曾提出过质疑：“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春秋》齐有孔虺，卫有孔连，陈有孔宁，郑有孔叔、孔张，此五族者皆无后乎？”^{[14] (1289)}生活于春秋时代的孔子被后人尊为祖先，除了其“圣人”的光环，当然还包括“圣人”所指涉的儒家文化。

滇南一带的孔姓彝族也尊孔子为其祖先，根据第五次《孔子世家谱》编修统计，该地区的孔姓彝族共两万余人。其中，石屏县孔姓彝族 938 户 4283 人，散布于坝心镇、牛街镇、冒合镇、异龙镇、陶村镇、宝秀镇、龙武镇、亚房子乡、大桥乡等 100 多个自然村。他们不仅追认孔子这



位遥远的祖先，还认同世祖孔厚。孔厚，字载物，明嘉靖元年（1522年）葬于建水县大四子村，墓旁有《族谱明辨纪略》一文。墓志铭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重修墓冢时所撰，其文如下：

族之有谱，犹国之有乘也。乘以纪累朝之始终，谱以传阖族之源流，二者为家国之切要焉。观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本水源，物且有然，而况人乎哉？追溯始祖，原是姓孔名厚，乃山东籍贯，南京应天府人也。曾荐贤书仕于黔之普安州。奈时逢改革，岁荒民变，甚至兵火延年，于祖有碍，不得已改姓普，由黔入滇至临潜居。孰意方出天罗旋入地网，倏值流贼作乱，吾祖乃旧逃奔。偶适此地，见山势盘桓，林木幽静，爰立宫室遂家焉，自此始祖厚娶孙氏，生二世祖一德；二世祖娶妻赵氏，生三世祖七人，分派七房。迄今子姓蕃昌，瓜瓞联绵，采芹折桂者代不乏其人。搃因先祖累积而成者。思我始祖仕于普安州，是由建业而入黔也。避乱而出忘，由黔而入滇也。卜居大四子，弃繁华而爱清雅也。独是祖宗事绩，难以详尽。

乾隆乙酉科乡进士、兵部侯推守备、后世孙宗圣敬题^{[15] (35)}

从文中可知，孔厚，祖籍山东，由南京入贵州普安州（今六盘水）为官，最后隐居建水大四子村。孔厚有七孙：孔卓、孔哲、孔杰、孔长、孔槐、孔溥、孔豪。其中，孔卓迁居石屏县底莫，死后葬于孔家村西北角。撰写铭文的孔宗圣是“乾隆乙酉科乡进士、兵部侯推守备”^{[16] (440)}。为给孔厚正名，他在《族谱明辨纪略》中写道：

兹为孔普两姓因辨明之。孙宗圣于乾隆乙酉科叨蒙祖宗默佑，已登乡荐赴京会试。寓于黔中，访我宗支。见有姓孔者，相叙及族谱，其人答曰：“我族谱由海岱而入于建业，虽南京人也，本山东籍也。先祖姓孔名厚者，仕于普安州，闻知避乱入滇，未审落籍何处。”试考其备细，乃一祖之孙，方知先祖姓孔，良非虚也。又知山东籍贯，洵不诬也。於戏！系出一脉，居分两地；人虽散处，谊属同宗。倘非先祖之灵验，其谁能知。且先祖曾仕普安州，间有以普为姓者，又以普安州为祖之姓名者。或又曰：“普是真姓，孔乃冒姓也。”若然，真是姓普则姓之矣，又何乐而姓孔乎？要之：先祖姓普不得已也，今复姓孔不忘本也。特辨明而敬述之，俾后世知所由来矣。^{[15] (35)}

孔宗圣进京赶考，路过贵州普安州，偶遇一孔姓人，巧的是他们都将孔厚视为祖先。那么，孔厚是否确有其人呢？文中提到，孔厚为应天府人，后被举荐入黔为官，那么他在为官之前应有功名，但《明清进士题名录》和《应天府志》中并无此人记载。此外，《普安县志·选举》《普安县志·职官》^{[17] (1~43)}和《普安州志·职官》^{[18] (31~34)}的年表中也无此人记录。此为其一。其二，一世祖孔厚墓碑上刻有“始祖考公字载物之墓”，二世祖名为“一德”，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恰是“厚德载物”一词，这种巧合会不会是后世建构的结果？其三，石屏孔家村孔卓墓碑上刻有“然亭八十上寿行一，葬于嘉靖十三年”。孔卓是孔厚之孙，孔厚葬于1522年，孔卓葬于1535年。若以20年为一代进行推算，孔厚寿命约为108岁^[注1]。其四，文中提到“先祖曾仕普安州，间有以普为姓者，又以普安州为祖之姓名者”，古人以地名为姓是常见现象，“普安州”的“普”恰好与建水一带土司大姓“普”一致，这或许为孔宗圣解释先祖曾经“由孔改普”提供了根据。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孔厚很可能是地方精英建构出来的祖先，抑或确有其人但名字并不叫“孔厚”。

明中期以前，滇南地区的彝族取名多遵循“父子连名制”，其后，为使“用夏变夷”政策顺利推行，除了传播儒学，为少数民族“赐汉姓”也时有发生。《滇志·羈縻志》卷三十记载：“各长官俱本土罗罗、和泥人，原无姓名，各从族汇本语定名，或随世递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呼。弘治初，知府陈晟以百家姓首二句，司分一姓，加于各名之上，唯纳楼未受。”^{[12] (97)}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唯纳楼未受”指的便是当地普姓土司。“改孔姓”的事例也有历史记载。《滇志·人物志》卷十四：“孔聘贤，通海人。万历乙酉举人。历民部郎……孔氏系出东鲁，自

句容入滇，为王姓者数世矣，至聘贤，始请于朝，复姓孔。”^{[12] (496)}这一历史事件很可能对滇南地区的孔姓彝族产生了影响。

另外我们发现，建水县西庄镇贝贡村的孔姓彝族也追认通海孔姓先祖。当地孔氏家庙《贝贡村孔氏家史》碑文有载：“祖辈孔启贵属临安府孔氏嫡派，迁居贝贡村教书，凭儒业传家，子孙兴旺……临安府支四十七世祖讳传公随徽宗南渡……五十三世祖讳荡公，由句容入滇。”^[19]他们认为迁入滇南的世祖为孔荡。笔者在石屏县孔家村抄录碑文时发现，孔启贵的名字出现在孔卓的墓碑上，是孔卓的十四世孙。我们在后来的调查中又得知，建水县西庄镇的孔姓彝族也去大凹子和孔家村参加祭祖活动。这意味着他们追认的世祖既是孔厚又是孔荡，但显然此二人的身份和年代并不相符。

笔者认为，滇南地区的孔姓彝族是从当地彝族分化出来的群体，他们所追认的祖先孔厚或孔荡是他们追溯与内地孔氏家族联系的“媒介”。他们通过建构祖先及家族迁徙历史，以追认具有“圣裔”身份的世祖作为“恢复”孔姓的依据，这些举动反映了滇南地区的彝族具有与内地汉族互动的强烈意愿，是一种从边缘参与主流的努力。

四、字辈体系的建构

字辈取名习俗源于周代祭祀中的昭穆制^{[20] (210)}，又被称为派字、班辈、行辈等，是用来标志世系次第分别和宗族内部等级身份高低的特殊代表字^[21]。在中国，大约从北宋开始，形成按照字辈取名的“世代排名制”^{[1] (59)}。滇南孔姓彝族在清中叶经历了由普姓改为孔姓的过程，但同样遭到“普乃真姓，孔乃冒姓”的质疑，于是借用汉族孔姓的字辈谱系，以强化其“圣裔”身份并建立内部秩序。

（一）“想象”与“失忆”

山东曲阜颁布的《孔氏行辈告示》中有载：“迩来我族人满数万丁，居连数百里，岂难目不能识遍，且耳不能闻遍，若无行辈则昭穆易紊，无表字则称谓不论。”^{[15] (16)}孔氏家族可视为一个人们共同体，世界各地的姓孔之人彼此不可能全都认识，但联结彼此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个人心中，好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的分析：“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用语言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中”^{[22] (140)}。在滇南彝族聚居区，建水、石屏一带的孔姓彝族与元阳孔姓彝族在语言、服饰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视对方为同一家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名字都带有两个符号：孔姓和字辈——孔姓指向孔子和孔厚，字辈则是他们作为正统孔氏家族成员的标识。很多非孔子后裔的彝族也被“请进”或“主动加入”孔氏家族共同体，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拥有一些共同的事物，同时也得遗忘许多事情。例如，2003年修纂《石屏县孔子世家谱》时，根据自愿原则，棕园村的普家人可以上孔氏族谱^[23]。元阳县胜村也存在一支由普姓改为孔姓的彝族，但他们否认自己姓普的历史。胜村孔姓彝族共364人，有三个分支，其中人口最多的一支所追认的祖先为孔闻电。从其名来看，字辈为“闻”，然而该名2007年才出现，在此之前为“孔文电”。按照《孔子世家谱》计算，“闻”字辈为第62代，“文”字辈则为第97代。当地孔氏家族在编修汉族谱时发现了这两个辈分的区别，为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谱系，将“文”写作“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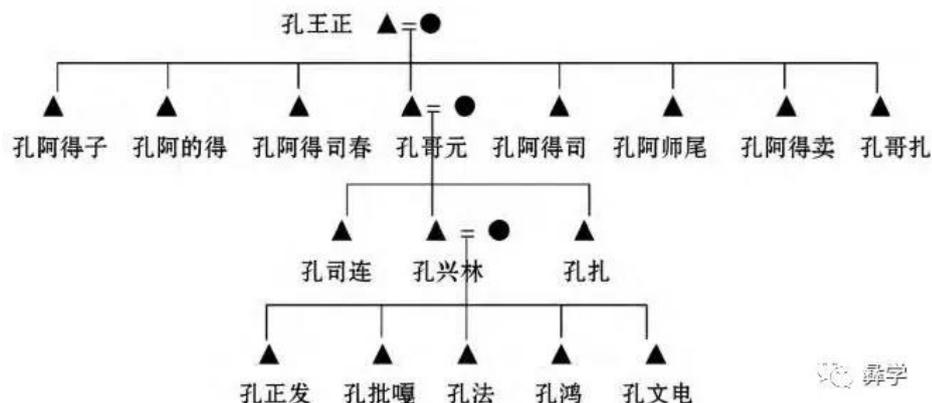


图 1、元阳县胜村孔姓彝族早期先祖谱系^[注2]

从这一谱系可以发现，孔文电的先辈无一人使用字辈，与其同辈的四兄弟也没有使用。笔者认为，他的名字中出现“文”很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后人通过改写将其换为他们认为辈分合理的“闻”；该地的一世祖并非“闻”字辈，胜村当下的字辈谱系也属建构之物。孔姓彝族的“改姓”和“借用字辈”的现象，实际上属于一种结构性失忆。埃文思-普理查德曾在非洲研究中指出，努尔人实际谱系与他们认为真实的谱系之间常常存在差距；在不断的分裂中，有些祖先被记住了，而另一些却被忘记了^{[24] (228)}。孔姓彝族在迁徙的过程中与其他人群接触，其中一部分被分化外迁，同时也有新的成员加入。他们常利用“共同过去”来凝聚成员，并在叙事中将过去加以确认、强化和重组，而重组常常以失忆、遗忘形式体现出来。

(二) 字辈秩序与社会整合

山东曲阜孔府为严格规范字辈取名，在《孔氏行辈告示》中宣告：“立行辈，所以分别尊卑。定表字，所以别长幼……凡我族人具当遵照后开行辈，取名训字。有不钦依世次随意妄呼者，不准入谱。”^{[15] (16)}孔氏字辈谱对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提升作用，并形成了“天下孔氏是一家”的亲和力。《石屏县孔子世家谱》中这样写道：“字辈从血缘上论资排辈，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在字辈谱面前，一切标志社会关系的年龄、学历、党龄、军龄、干龄、职务、级别等等只能‘退避三舍’，服从字辈谱的长幼之分。”^{[15] (17)}遵守长幼秩序的传统，一方面与彝族社会文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是他们采用汉人字辈取名而促成的一种结构化行为。字辈犹如图式，在实践中被储存于个人身上，反过来又保证了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历时不变的特性。修族谱特别强调字辈的排序问题，家族成员在阅读族谱时，明晰了各自的辈分，他们的行为也在不自觉中受此影响。字辈就像一种标记的行为，当这一行为被所有人视为一种常识遵循时，习性便得以生成。家族成员常常无意识遵循这样的秩序，并将其视为生活的一种常识，“习性导致对既定秩序和该秩序的保护人即长辈的命令的服从”^{[25] (230)}。

2002年，经国际儒学联合会批准，全国孔氏宗族开始续修《孔子世家谱》。石屏县孔姓彝族随即成立相关组织开始修谱，2004年5月《石屏县孔子世家谱》一书面世。在编修族谱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普姓彝族被计入其中的现象，前提是改姓。事后，他们将新修的族谱寄往山东曲阜。2005年5月，全国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会长孔德塘等人邀请石屏的孔庆福到四川参加家谱续修工作调研^{[15] (1)}。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石屏一带孔姓彝族的“圣裔”身份。

元阳县胜村孔姓彝族却并未进行统一修谱。为陈述方便，笔者将该地孔姓彝族分作三类：(1)“大孔”，61户，编有汉文族谱；(2)“贝玛孔”，28户，贝玛是本地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3)“改姓孔”，6户，这支本姓普^[注3]。这三支虽然存在区别，但都笃信自己为孔子的后人，并认可“山东—建水—石屏—元阳胜村”的历史迁徙路线。他们虽然没有像石屏县孔姓彝族那样编修统一的族谱，但成员的称呼以字辈为准，行为也受到字辈规范，村中诸多集体性事务均一起

操办，“孔氏家族族委会”是重要的联结机构。族委会的成员来自三个分支，每一分支所分管的事务并不一样。据了解，最开始的族委会成员仅限“大孔”，后来陆续加入了其他两支。族委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婚丧嫁娶和处理家族内部纠纷方面。字辈作为一种图式被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以字辈为准的秩序也在修谱和各类仪式过程中得到强化，并被孔姓彝族运用于实践当中，成为建构认同和社会整合的依据。

五、结论

滇南地区的孔姓彝族曾姓普，清乾隆年间，族内精英孔宗圣撰写《族谱明辨纪略》一文，梳理家族历史，以世祖孔厚确认与山东曲阜孔氏家族的联系，孔子这一祖先记忆得以形成并延续至今。彝族文化传统中并无按字辈取名的习俗，但孔姓彝族主动向汉族采借该家族文化项，并进行体系化建构，这表明，字辈符号蕴含的长幼秩序和孝悌原则利于该群体有效建立其自身网络，强化成员的家族认同，利于其在复杂多元的族群关系中安身立命。儒家文化在滇南地区的传播对当地彝族群体产生了文化冲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彝族主动向汉族学习的诸多现象。滇南孔姓彝族既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深重影响，也保留着原有的文化传统。他们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和学习程度的差异，真实地反映在当下孔姓彝族内部。我们在看待这一现象时，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冲击-回应”，而须将其置于大的历史脉络中予以考察，由“普”到“孔”的姓氏变化实为王朝与土司势力变化的缩影；当地彝族在与汉族接触过程中，从边缘参与主流文化，主动学习和借用汉族文化，为其自身发展提供新动力。

注释：

- [1] 此处以 20 年作为一代推算已是极为保守。因为按铭文表述，孔厚由南京入黔为官，娶妻生子，后几经流转才到大凹子安家，其年龄应该不止 20 岁。
- [2] 该谱系图根据胜村彝文谱牒翻译整理而得。人类学研究中，“▲”代表男性，“●”代表女性，“|”代表亲子关系。
- [3] 资料来源于 2014 年胜村村委会人口登记簿。

参考文献：

- [1] 纳日碧力戈，姓名 [M]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 [2] 王泉根，中国民间的字辈谱 [J] 民俗研究，1994(4) .
- [3] 杨开达，论云南清代彝族教育家文论家李元程 [J]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
- [4] [美]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M] . 林同奇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5] 关凯，文化秩序中的国家与族群 [J] . 文化纵横，2011(6) .
- [6] [美] 詹姆士·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 [M] . 王晓毅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 [7] 马建雄，再造的祖先 [M] .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 [8] 马翀炜、张雨龙，对泰国北部山区一次村民选举的人类学考察 [J] .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6) .
- [9] 方国瑜，彝族史稿 [M] .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 [10] 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J]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
- [11] 马翀炜，从边疆、民族理解国家文化软实力 [J] .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
- [12] (明) 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 滇志 [M] .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 [13]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 [M]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 [14] (清)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 乐保群、吕宗力点校. 日知录集释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5] 石屏县续修孔子世家谱指导小组. 石屏县孔子世家谱 [Z] . 内部资料，2003.
- [16] 丁国栋修，梁家荣纂，云南府县志辑 [Z]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17] 黄家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Z] .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18] (明) 高廷愉纂, 普安州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1.
- [19] 宗林, 贝贡村——扑朔迷离的孔姓彝族古村落 [J]. 创造, 2016(12).
- [20] 何晓明, 姓名与中国文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21] 于鹏翔、赵丹, 略论满族字辈谱的形成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4).
- [22]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M]. 吴睿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23] 邱运胜, 文化融合与祖先记忆——滇南孔姓彝族人的个案考察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6(3).
- [24] [英] 埃文思-普理查德. 努尔人 [M]. 褚建芳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25] [法] 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 [M]. 蒋梓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网络文章】

从“中国人”到“新加坡人”，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https://mp.weixin.qq.com/s/C4dZiV4j9aP_hMgwVe2k8g

许振义

六七十年前，你走在新加坡大街上，随便逮住个华人问：“你是什么人”，大概每个都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唐山人”（在当时语境中，“唐山”即是“中国”，并非河北唐山）等等。反正不会有一个说“我是新加坡人”。

但现在，你走在新加坡大街上，随便逮住个土生土长的，60岁以下的华人问“你是什么人”，大概每个都会说“我是新加坡人”。也有可能说“我是华人”“我是唐人”。反正不会有一个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唐山人”。为什么？

现代新加坡起源于1819年。那一年，莱佛士开埠，把石叻坡（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于1826年与槟榔屿（今槟城）、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亦称“叻屿呷”，并于1832年把海峡殖民地首府从马六甲迁到新加坡。

19世纪中叶到上世纪中叶，英国、荷兰政府对南洋诸埠精心经营，胶锡等产业带动本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加上政治稳定，治安相对良好，吸引了大批华人、印度人、武吉士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欧洲人迁徙、经商、务工，有些人最终定居下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心系的仍然是遥远的祖国，到南洋谋生不过权宜之计，落叶终究要归根，而非落地生根。其中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例如峇峇娘惹（亦称土生华人、侨生华人、海峡华人），他们有些自永乐年间便南下，早已在南洋繁衍了几代人。

到了英殖民时代，英国政府认可峇峇娘惹具有英国国籍，而《北京条约》之后南来的华人称为“新客”，他们是中国的侨民，并不是英国子民。一些富裕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海峡华人自诩为“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有别于其他华人，他们崇尚英式生活，不但在政治上效忠英国，在文化上也认同英国。

这是普遍现象，但也有例外，林文庆（Lim Boon Keng, 1869-1957年）和宋旺相（Song Ong Siang, 1871-1941年）同为海峡华人，宋旺相只爱新加坡和英国，但林文庆心里既有星洲也有鹭岛（厦门），既有英国也有中国。与海峡华人的普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人口主流的华人新客仍以中国为政治效忠的对象和文化认同的主体。



在晚清，清朝贵族和高官到访新加坡时，新客侨领多是身穿清朝官服，行叩拜礼，而海峡华人领袖则是身穿西服，弯身鞠躬为礼，由此可见彼此的差异。

到了晚清，本地华人如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到了抗日战争时，本地出现长时间的赈济筹款活动，还有南侨机工北上支援抗战，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前往中国。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华人的政治效忠情况。

但是，“落叶归根”这个情况到了二战前后发生了微妙改变。二战时英国无法真正保护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等地陆续落入侵略者手中，生灵涂炭。中国自顾不暇，当然也没有能力保护侨民。于是，本土意识开始萌芽。这首先体现在政治上，二战之后，新马开始出现反帝反殖思维和社会运动，要求自主、自治。印度尼西亚 1949 年独立，马来西亚 1957 年独立，新加坡 1959 年自治，1965 年独立，完成了政治效忠的转移。

在独立建国几十年之后，如今的东南亚华人不会再像先辈一样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承认自己是华人、华裔。

从侨民到公民

中国人出洋，大概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短期出国求学、任职、做生意，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二十年，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高度认同中国，与所在地不会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随时可以割舍。在心理上，完全是“客”的身份。

第二阶段是华侨阶段，此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差别，主要是已经做了定居的心理准备和安排，通常会作一些在当地的中长期规划，包括取得永久居住权，购置不动产，也开始关心所在地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发展，自己的人生与所在地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对所在地有一定的认同。在心理上，开始由“客”向“主”转变。

第三个阶段是华人阶段，此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主要差别是刚转换了国籍，宣誓对新的国家的政治效忠，在法理上已是“主”的身份，但是，在心理上仍在进行由“客”到“主”的根本转移。这种转移并非朝夕可以完成，因此，这一阶段的人们有时不免陷入疑惑和矛盾，尤其是所在国和祖籍国发生矛盾的时候，自己会陷入“先救母亲还是先救妻子”的困扰。有时候在面对祖籍国的亲友或来访的高官时，不免还要表明一下自己热爱祖籍国之心。甚至有些人还要加一句“入籍不过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云云，我虽不齿后者言行，但也不是无法理解。

第四阶段是过了至少两三代的海外华人。一般来说，这些海外华人无论在法律上或心理上，已完成了从“客”到“主”的转变。对他们来说，如果文化的根没断，热爱中华文化是可以的，这与“热爱祖国”无关。不“热爱中国”，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时大力伸出援手，如 1998 年长江大水、2008 年汶川地震，但是，在政治上，效忠对象不会是中国；在文化心理上，认同的主要是本地文化，而不一定是祖籍文化。

“中国人”、“华人”、“华裔”这三个名词在英文中都是“Chinese”，如果没有细心分辨，不会感觉有何差异。“中国人”兼具政治、文化、民族意义，“华人”二字只有文化和民族意义，而“华裔”往往只剩民族意义。另外还有“华侨”这一义项，特指具有中国国籍但定居海外的中国人。以“华人”、“华裔”为表述，显然更加符合东南亚华人的现实情况，详见下表。

“中国人”这个义项在所有四个属性上都是中国属性，华侨除了定居地不是中国之外，其他三个属性也都是中国属性。在外国定居的中国公民是“华侨”；中国人与华侨无论在政治身份或文化身份上都不存在本质差异。“华人”这个义项只有两个属性与中国有关，一个是民族属性，一个是文化属性，也就是说，华人懂得汉语（或方言），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政治上不效忠中国。



华人身份的各个义项及其属性

义项	定居地	政治效忠	文化属性	民族属性
中国人	中国	中国	中华	华人
华侨	非中国	中国	中华	华人
华人	非中国	非中国	中华	华人
华裔	非中国	非中国	非中华	非华人

至于“华裔”，已经完全融入当地文化环境，除了本身的民族身份未变之外，与中国或中华文化再无关联，甚至连民族姓名都未能保留，基本已经丧失华人文化身份。东南亚许多地方的华裔如菲律宾华裔、印度尼西亚华裔即是如此。总体而言，中国人/华侨、华人、华裔这三个义项在“中华性”（Chinese-ness）的表现上应该是递减关系。

新加坡华人社会目前努力做的正是防止向“华裔”这个方向发展。东南亚乃至澳洲、欧洲、北美许多城市都有华裔，有他们聚居的唐人街、唐人区。这些唐人街、唐人区与新加坡最大的差别有两点：其一，华裔在这些国家是少数民族，其二，这些国家、地区有本身的主文化，中华文化只是亚文化；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新加坡主文化不免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如果新加坡华人丧失了中华文化的根，就成了无根之漂萍。因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2012 年说：“应该保留文化的根，以免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迷失方向，走错了路。”

新加坡存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个主要民族和文化，而现代新加坡则奠基於英国人引入的文化和制度。因此，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马来文化都对新加坡起着重要影响，共同铸造了新加坡文化。

在过去二三十年，新加坡秉持的文化观一向是“文化熔炉”（Melting Pot）概念，即大杂烩式地把不同文化融为一炉，例如在华文文学中使用大量马来语词汇，或在中国戏曲作品中使用马来或印度题材。然而，这并非对不同文化的杂糅融化，而是从彼方吸取养料，从而发展、加强自己的文化，因此，“熔炉”的概念并不准确。2016 年 2 月 10 日，大年初三，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春节团拜的致辞中，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Thaman Shanmugaratnam）谈到建设新加坡文化的三个要素，其中一个就是巩固新加坡国家身份认同感。他强调应该保留并发扬不同种族各自的文化特点，同时积极了解并参与不同族群的文化活动，把不同文化融合为一体。

在新加坡建国初期，经历了五六十年代几场种族暴动，人们心有余悸，对种族、语言、宗教等问题特别敏感，因此，十分重视“政治正确性”。表现在文化观上，就是强调淡化本身文化特点，互相融合，因此推崇“熔炉说”。然而，到了近几年，发现过度强调融合首先是实际上行不通，因为不同文化的融合并非一朝一夕可至，其次是不利于原生文化的继承，画虎反类犬。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经过独立以来五十年的国民教育和社会治理，这一代新加坡人相对祖辈来说已经是“肤色色盲”，种族歧视甚至种族敌视现象已基本不存在。

与此成为强烈对比的，是在西风渐进的大气候下，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对自己母语和母族文化知之甚少，几有文化断根之虞。重新构筑各种族文化身份的工作已刻不容缓，此时提出“沙拉说”即：各种族保留自己的文化特点，但又能融合，确有时代需要。因此，近年来我们看到新加坡华社积极重新构筑自己的文化身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是一例。

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目的是“保存和继承传统华族文化，并发扬及推动本地华族文化”，这明显认识到“传统华族文化”和“本地华族文化”存在着微妙区别。所谓“传统”就是在早年移民时期从中国祖籍地继承而来的原生文化，而“本地”指的就是本土化之后的衍生文化。



新加坡华社认为这两方面都该并重，不应偏颇。中心的目标是“立足华族，外延到他族，实现文化融合”。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尽管新加坡各个种族文化“和而不同”，但是，希望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融合，最终达到三个目的，即：传承华族文化、促进不同族群的融合、达致文化认同，形成新加坡自身的特色文化。除了华族之外，马来族和印度族也在构建自己的文化遗产中心，反映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生态。

2015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动员海内外37名文史学者，耗时三年多，一同编写、出版了《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说：“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脉络，在1965年建国前基本清楚，但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这条主线逐渐变得模糊，因为华社在社会、经济、国家认同及社团转型等层面上，都和以往不同，影响了华人历史的走向。”可见编纂此书的目的之一，是整理独立之后华社的历史发展主线。修史是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也是新加坡华社重新构筑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工作。

华社还积极通过民间文艺协助本身文化身份的构筑，例如资助湘灵音乐社、新加坡戏曲学院、城隍艺术学院、敦煌剧坊等民间文艺团体，尝试通过南音、戏曲等强烈的传统文化符号，再次推动原生文化向学校、社区等社会基层组织作重点传播。

2015年11月7日，中新两国领袖共同为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也成了在新加坡推广中华文化的又一支生力军。中国文化中心组织文化活动、教学培训、讲座、信息服务等，为新加坡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中国儿艺马兰花艺校。这是由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创办的儿童艺校，目的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儿童和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戏剧表演产生兴趣，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提高华语水平。

中国文化中心也致力在新加坡推广中国民间文艺。如：2016年4月29至30日，已经移民新加坡二十多年的中国一级老旦专业演员田平举办第一场“田平说戏”京剧系列演出，别出心裁地安排上海唯一男旦演员牟元笛以示范表演的方式，示范及解说水袖舞、上头、跷功等技巧，表演《贵妃醉酒》《战宛城》《游园》《天女散花》等片段。

新加坡华社的构成复杂，既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定居、入籍的新移民，也有在本地生活了三四代人的老移民，或称本地人。前者出生、成长于中国，在中国接受社会化过程，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及认同自然与后者不大一样。即便是本地人，由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不一样，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和认同也不一样。

新加坡华社目前构筑文化身份的工作，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通过有民间文艺造诣的新移民和本地人来带动人们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接受和喜好。我们都很熟悉新移民对新加坡在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的贡献。其实，新移民在文化上对新加坡的贡献也不少。这种贡献绝不仅仅在提高本地的文化和艺术水平上。其中，就包括了与本地人一起，重新塑造新加坡华人文化身份。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